

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已經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我們坚决要求繼續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賬派所能推翻的。我們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偉大的成績，广大羣众是亲眼看到的。問題只是我們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說，在公社所有制問題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問題，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沒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級干部沒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說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們向广大羣众公开說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時間內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們手里，广大羣众就一定会同我們站在一起。必須估計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賬派將會出来譏笑我們；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將會进行破坏。但是，我們要告訴干部和羣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現的时候，对于我們絲毫没有什么可怕。我們應該沉得住气，在一段時間內，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頂住，讓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們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羣众一定会很快地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們將會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經過这样一个盤頓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們同羣众的团結將會更加紧密。在偉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多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暢，更加充滿干劲。我們一定能够在一九五九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一九五九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們的。

## 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这几个月，从去年八月起，现在是四月，这八个月里头出了兩件事，都跟我們有关。一个是台灣問題，一个是西藏問題。去年八月大鬧台灣，現在大鬧西藏。我們就有這兩块地方沒改革。西藏是陆地，有公路，可以用車子走。西藏又沒有任何一个国家跟它訂立台灣那样的条約，我們空軍可以去，陆軍也可以去。而台灣的性質就不同了，台灣跟美国入訂了条約。去年美国人在中东鬧得混不下去，中东事件，搞得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以及那許多美国人都神魂不安，睡不着觉。联合国通过叫他撤兵的第三天，我們就打炮。那里告一段落，这里就跟着来，美国人也跟着来，吓得屁滾尿流。从美国西海岸調兵，还从地中海調一个艦队到台灣海峽集中。一时候他摸不到我的底。杜勒斯后头講，这是他們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中。在一个地点集中这么多，比如，單是航空母艦，美国一共有十二条，这回集中了六条，集中了一半。其它的軍艦很多。拚命調，生怕我們把金門、馬祖、台灣夺回来。蔣介石那个时候慌得一塌糊涂，就准备搬家，有一个經濟部确实搬到乡下去了。八月二十三日一打炮，当天（或者是第二天）美国就下决心調兵。这是八月。九月一个月，到了十月，他就看清了，馬上撤回去了，回西海岸，回日本，回菲律宾。地中海的，因为路远，剛剛調来，剛剛到，到馬尼拉修理修理，馬上又回去，手忙脚乱。結果就是十一月四

日美国的选举，共和党失败，民主党胜利了。无代价的作了义务劳动，帮助了民主党。美国人历来欺侮我们，在中东事件以前，他公开发表一个备忘录，说中国之坏，坏得透顶，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搞出许多理论和根据。他又断绝日内瓦的谈判。那好，我们就限个期限来谈。后来到了中东事件的末尾，他东西来了，他比我们那个期限推迟了几天。我们的期限是十五，他十七号回的信，要谈判。我们没有发表，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在乎你那个东西，我们要打炮了，我就不发表那个东西。头一天我们打了一万九千发，赵家驊（他的参谋长）就是这个时候打死的，另外还有一个副司令吉星文也打死了，俞大维身上也染了一点血。我们祖国的土地，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旧小说里头一个“狂生夜坐”的故事，说有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在窗口那个地方伸出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一个张飞样子（笑声），画得象我们现在袁世凯那个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笑声），没有那么长就是了（笑声），两个人就这样顶着（笑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走了。（笑声）《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了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这次会议是个大团结的会议，是一个决定方针政策的会议。我们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什么一些右派分子选进来加入我们的领导机构呢？世界上就有左、中、右，你们只有左、中而无右，就不完全。你说批评了共产党一顿，

搞了个猖狂进攻，就不要人家了？人家现在不进攻了，他猖狂一会不猖狂了，或者是暗中猖狂，心中猖狂，不表面化了，也行。比如章乃器这位先生，以及章罗联盟这些人，他那个心也许是六十年以后，在六十年以内难化的。有这么少数人，我说也可以。章乃器是民建的，罗是民盟的，你们大概都是嫌得他们要死了，不想要他了，我说还是要，要着好。马克思主义对宇宙的观察，第一个概念，宇宙是统一的，不是各自孤立的。但是宇宙又是多样性的。你看动物中间，又有人类，又有狗类、牛类、羊类，这都是高级动物，这是胎生动物。还有卵生动物，比如鸡、鸟、鱼。这还算脊椎动物。此外还有软体动物。你看，动物就这样复杂。至于讲到植物，那还有植物。植物当中还有低级的植物，比如微生物。世界上有各种各样，人有阶级之分。在我们这里，是逐步消灭阶级，这也不能性急，要慢慢来。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老是整风，可是受不了，不要老那么整，整得厌烦了。怎么办？停一年、两年、三年都可以，你厌烦，我就不整。你不厌烦，你就整自己，大家帮助一下。当然，不是一点批评也不要，一团和气，但大体上那个紧张局势要缓和一下。先生同学生的关系要缓和一下，先生还是先生，学生还是学生。先生为什么叫先生呢？他就是多了几岁年纪，多了一点学问，这就叫先生。先生有不如学生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也是真的。但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先生闻道早一点，他这个业务专门一点。老是那么批评先生，先生教书教不下了，那也不好。还是要尊师重道。同时学生要帮助先生，因为学生是青年，耳聪目明。各民主党派内部的关系，各民主党派与社会的关系，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看现在这个气候还不是一九五七年那个气候了。那个时候许多人不自觉，现在这个自觉提高得多了。我们不是一棍子打死人的办法，要留有余地。

## 党内通信

省級、地級、县級、社級、队級、小队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几个問題，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問題，包产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級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上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增加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个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机关缺少經驗，一个劲儿要密，有些竟說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問題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的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給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經驗，根据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水肥、土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管理水平高

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內达到一个比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內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問題，節約粮食問題。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閒时少吃，忙时吃干，閒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蘿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儲备粮，年年儲一点，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奋斗，粮食問題可能解决。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险的。須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問題，播种面积要多的問題。少种、高产、多收的計劃是一个远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內大都不可行。三年之內要力爭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針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額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問題，机械化問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决，七年以內中解决，十年以內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設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員和农村有經驗的鉄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进，試制新式农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学肥

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問題，講真話問題。包产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累積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此唱的是低調，目的在於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 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你們講了那麼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着。

講點這樣的意見。我看了同志們的記錄、發言、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談了話，我感到有兩種傾向，這裡講一講。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吳稚暉說，孫科一觸即跳，因此有一部分感到有壓力，即是不讓人家講壞話，只愿人家說好話，不愿听壞話。我勸這些同志要听。話有三種，嘴有二用。人有一個嘴巴，一曰：吃飯，二曰：講話之義務。長一對耳朵，能听，他要講，你有什么辦法？有一部分人就是不爱听壞話，好壞都要听。話有三種，一種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的或不甚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

現在黨內外夾攻我們。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麼倒台？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要垮台了。這是右派講的。黨內一部分意見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的言論都出來了，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有些就是右派。動搖分子，他們看不完全，做點工作可以轉變過來。有些人歷史上有問題，挨過批評，也認為一塌糊塗，如廣東軍區的材料。這些話都是會外的講話，我們是會內外結合，可惜廬山上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來，象江西黨校羅××、陳銘樞。這是江西人的責任，房子太小么！

不分什麼話，無非是講一塌糊塗。這很好，越講得一塌糊塗越好，越要听。我們在整風中創造了“硬著頭皮頂住”這樣一個名詞，我和有些同志講過，要頂住，硬著頭皮頂住。頂好久？一個月、二個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們有的同志說“持久戰”，我很贊成，這種同志是多數。

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听么！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難是難听，歡迎，你這麼一想就不難听了！為什麼讓人家講

呢？其原因：神州不会墮泥，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星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說我們脫離了羣眾，还是拥护我們的，我看是暫時的，就是三个月。春節前後，我看羣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那麼一點，但是並不那麼多，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問題是公社這裡。我到遂平詳細地談了兩個多鐘頭，嵯峨山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我，七、八、九三個月，平均三千人參觀，十天三萬人，三個月三十萬人。七里營聽說也有這麼多人參觀，除了西藏都來看。唐僧取經。這些人都是縣社隊幹部，也有省地幹部。他們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經驗真理，打破了羅斯福免于貧困的“自由”，搞共產主義。這股熱情，怎麼看法？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嗎？我看不能那樣說，要想一點，無非是多一點。這種分析是否恰當？三個月當中，三個三十萬朝山進香，這種廣泛的羣眾運動，不能潑冷水，只能勸說：同志們，你們的心是好的，事情難以辦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驟。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要一口吃成個胖子不成。林×一天吃一斤肉還不胖，十年也不行。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至少30%是積極分子，30%是消極分子及地、富、反、壞、官僚、中農和部分貧農，40%隨大流。30%是幾個人？一億幾千萬人，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非常積極。他們願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嗎？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

階級、半無產階級。隨大流者也可以，不願意的30%。總之，30%加上40%為70%，三億五千萬人在一個時期有狂熱性，他們要搞。到春節前後有二個多月，他們不高興了，變了，幹部下鄉都不講話了，請吃紅薯、稀飯，面無笑容，這叫刮“共產風”，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是什麼人？“共產風”主要是縣社兩級幹部，特別是公社一部分幹部，刮生產隊和小隊的，這是不好的，羣眾不歡迎，堅決糾正，說服他們。用一個月的功夫，三、四月間把風壓下去，能退的退，社與隊的賬清楚了。這一個月的算賬教育是有好處的，極短的時間，使他們懂得了平均主義不行，“一平二調三抽谷”，是不行的。聽說現在大多數人轉過來了，只有一部分人還留戀“共產風”，還舍不得。那裡找這樣一個大學校，短期訓練班，使幾億人、幾百萬幹部受到教育？東西要交回，不能說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自古以來沒有這個規矩，一萬年以後也不能拿起就走。有，只有青紅幫，青儉紅劫，明火執杖，無代價地剝削人家的勞動，破壞等價交換。宋江的政府叫忠義堂，劫富濟貧，理直氣壯，可以拿起就走，拿的是土豪劣紳的，那個章程我看是可以的。宋江劫的是“生辰綱”，就是我們的打土豪，劫的是“不義之財，劫之無碍”，刮自農民歸農民。我們已長期不打土豪，打土豪、分田地歸公那可以，因為那也是不義之財。我們刮“共產風”，取生產隊、小隊之財，肥豬、大白菜拿起就走，這樣是錯誤的。我們對帝國的財產還有三種辦法：征購，贖買，擠塔，怎麼能剝削勞動人民的財產呢？為什麼一個多月就息下這股風呢？證明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不信有歷史材料為証。三、四月和五月，有幾百萬

干部和几亿农民受了教育，講清了，他們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財是不义之財，分不清界限。沒有讀好政治經濟学，沒搞通价值法則、等价交換、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說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几分通，七八分通，教科書還沒懂，叫他們讀，公社一級不懂点政治經濟学是不行的。不識字可以講，通几分，可以不讀書用事实来教育。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发之，一字不識，強迫他作詩，他口讀，叫別人写，他說有些讀書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我不反对扫文盲。柯老說，全民进大学，我也贊成，不过十五年得延長。还有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將軍，打了仗以后要作詩，

“出师儿女惡，归来笳鼓竞，借問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律歌：“敕勒州，阴山下，天山穹廬，籠盖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风吹草低見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識的人。一字不識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們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經濟学？我看大家可以学，講講政治經濟学，不識字可以講，講講就懂了。教科書我沒看。略为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時間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我們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从去年郑州會議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級會議，影响五級會議都要檢討。北京來的人哇啦哇啦，他們就听不进去，我們檢討多次，你們就沒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么！要人家講么，要听听人家的意見，我看这次會議有些問題不解决，有些人不会放棄他們的观点，无非拖着么！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話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說就是硬着头皮頂住啊，无非是罵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話就一股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頂住，听他一个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他們贊成不贊成是他們的事，不贊成，如我錯，我作自我批評。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說大跃进，总路綫，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面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講？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四条路綫，陈独秀路綫，立三路綫，王明路綫，高饒路綫，現在又是一条路綫。站不稳，扭秧歌（国民党說我們是秧歌王朝）。他們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現在不講。在南宁會議，成都会議，党代大会講过。1956、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講成思想方法問題。如果講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講，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們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与右派不同，他們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沒有經驗，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不住脚了，如恩来同志勁很大，受过那次教訓，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恩来的他們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們的地位而代之。不講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說：“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面是經過斟酌的了，如果戴高帽子，这次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

資產階級壓力下右起來了。

一個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都登出來，一年登到頭，登得完登不完？還有文章長短，我看至少要一年。這樣結果如何？我們的國家就垮台，那時候帝國主義不來，國內人民也會起來把我們統統打倒。你辦那個報紙天天登壞事，無心工作，不要說一年，就是一個星期也要滅亡的。登七十萬條，專登壞事，那就不是無產階級了，這就是資產階級國家了，資產階級的章伯鈞的設計院了。當然在座沒有人這樣主張，我是用夸大說話。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若不正確的部分不要）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不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這些同志據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不是左派（不加引號的左派）。我所謂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一些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重復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距右派還有30公里，因為右派很歡迎這個論調。現在這種同志的論調右派不歡迎才怪！這種同志採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不相信，將來看。這些話是在大庭廣眾當中講的，有些傷人；現在不講，對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題目中加一個題目，團結問題，還是單獨寫一段，**拿着團結的旗幟：人民的團結，民族的團結，黨的團結。**我不講對這些同志是有益還是有害？有害，還是要講。我們是

馬克思主義政黨，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講，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講。二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講。我說還是要講嗎？一條是要講，一條是要听人家講。我不忙講，硬著頭皮頂住。我為什麼現在不硬著頭皮頂了呢？頂了二十天了，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馬歇爾八次上廬山，周恩來三上廬山，我們一上廬山，為什麼不可以？有此權利。

**食堂問題。**食堂是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办好，自願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我看如果在全國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滿意了。一講，吳芝圃就很緊張，不要怕。河南等省有50%的食堂還在，那也可以試試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國來講的。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拚命干，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粗人，很不文明。三分之一農民，一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第二個希望一半左右，二億五千萬，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南、雲南、上海等等，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食堂並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羣眾創造的，河北1956年公社化以前就有辦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聖說：食堂節省勞動力。我看還有一條，節省物資。如果沒有後面這一條，就不能持久。可否辦到？可以辦到。我建議河南同志把一套機械化搞起來，比如自來水，搞個東西不用挑，這樣一來，可以節省勞動力，還可以節省物資。現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總司令，我贊成你的說話，但又和你的說話有區別。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個中間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科學院昌黎調查組，說食堂沒有一點好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學“登徒子好色賦”的辦法。登徒子攻擊宋玉三條：漂亮，好色，會說話。不能到後宮去，很危

險。宋玉反駁說：“漂亮是父母所生，會說話是先生所教，好色無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國出佳人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陳東家之子，增一分過長，減一分過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長，是大部，如冶金部長、煤炭部長，還有什麼農業部長。科學院的調查組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攻其一點的辦法，無非是豬肉，頭髮卡子。無論什麼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錯誤。我也看過列寧的手稿，改得一塌糊塗，沒有錯誤，為什麼要改？食堂可以多一點，再試試看，試他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成。我建議會不會垮？現在沒有垮一半，準備垮一半，垮七分。要垮就垮，辦得不好，一定要垮。共產黨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業，办好農業、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文化教育。

許多事根本料不到。不是說黨不管黨嗎？現在計劃機關不管計劃，一個時期不管計劃。計劃機關，不只是計委，還有其他各部，還有地方，一個時期不管綜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諒，計委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會議後不管了。名曰計劃指示，等於不要計劃。所謂不管計劃，就是不綜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要多少鐵，要多少交通。煤鐵不能自己走路，要車馬運。這點我沒料到。我和××，總理根本沒有管。不知可說也。我不是開脫，也是開脫，因為我不是計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對建設根本外行，對工業計劃一點不懂。在西樓（注：北京中南海西樓）時曾經講過，不要寫英明領導，管都沒管，還說什麼英明。但是，同志們，1958、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建委責任在別人，恩來、××，現

在應該說我，實在有一大堆事沒管。始作僞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大辦鋼鐵的發明權是柯慶施還是我？我說是我。我和柯慶施說過一次話，說六百萬噸，我找大家談話，有×××也覺得可行。我6月講1070萬噸，後來去作，北戴河搞到公報上，××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推了小、土、羣……看了很多討論，大家講還可以搞，要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降低硫的成份，出真正好鐵，努力奮鬥，只要抓，也有可能。共產黨有個方法叫抓。共產黨和蔣介石都有兩隻手，共產黨的手是共產主義者的手，一抓就抓起來了。鋼鐵要抓，糧、棉、油、麻、絲、茶、糖、藥，還有煙、果、鹽，農林牧副業中有十二項，要抓，要綜合平衡。各地不同，不能各個縣都一個模範。湖北有九公山，萬山雲中長竹林，要搞糧食，把竹木不搞了。有些地方不長茶又不長甘蔗，要因地制宜。蘇聯不是搞過回民地區养猪么？豈有此理！

工業計劃，搞了一篇文章，写得還好。至於黨不管黨，計劃機關不管計劃，不搞綜合平衡，搞什麼去了？根本不著急，總理著急他不急。人不著急，沒有一眼神氣，沒有一股熱情，辦不好事情。有人批評計委×××同志，是：“足將進而趨退，口將言而囁嚅。”但也不要象李達，太急了，也不行。列寧熱情磅礴，實在好，羣眾很歡迎。口將言而囁嚅無非有好些顧慮。上半月顧慮甚多，現在展開了，有話講出來，記錄為証，口說為証，以此為証，你們有話就講出來。你們抓住，就想整我么？不要怕穿小鞋。成都會議講過，不要怕坐班房，甚至於不要怕殺頭，不要怕開除黨籍。一個共產黨員，高級幹部，那麼多顧慮，就是怕講得不对受整，這叫

“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禍从口出，我今天要闖禍，兩種人都不高興我，一種是觸不得，一種是方向有點問題。不贊成你們就駁，說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事實上紛紛在駁，不過不指名。江西黨校、中級黨校的那些意見就是駁，說始作僞者，其無後乎。一個是1070萬噸鋼。1070萬噸鋼是我建議，我下的決心。其結果九千萬人上陣，××人民幣，“得不償失”。

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建議之權。北戴河決議是我建議寫的。當時嶺南山章程如獲至寶。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報。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有一點。以後新聞記者要離開。

我有兩條罪狀，一條叫1070萬噸，大煉鋼鐵，你們贊成，也可以給我分一點，但始作僞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責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還有總路線，是虛的，實的，你們分一點，免之于工業、農業。至於其它一些，別人也要分担一點。你那大砲也相當多，我們不准，心血來潮，不謹慎，共產共的快。在河南講起，江蘇、浙江的記錄傳的快。說話不謹慎，把握不大，要謹慎一點。長處是一股干劲，肯負責任，比那淒淒慘慘戚戚要好。但放大砲在重大問題上要謹慎。我也放了三大砲，公社、鋼鐵、總路線。彭德懷說他粗中無細，我是張飛粗中有細，人民公社我說集體所有制，我說從集體所有制到共產全民所有制的過程，兩個五年計劃太短了一點，也許要二十個五年計劃。

說要快，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天天想着歐洲革命要來了，又複雜，反反覆復，一直到死了，還沒有來，到列寧

時才來了。那不是性急？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藉口：列寧說世界革命形勢到了，以後沒有來。）馬克思開始反對巴黎公社，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革命。季諾維也夫後來被殺了，馬克思是否也殺呀？巴黎公社起來了，他又贊成，估計會失敗，看到這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三個月也好。要講經濟核算，這划不來。我們也有廣州公社，大革命失敗了。我們現在的工作是否象1927年那樣失敗？象二萬五千里長征，大部分根據地喪失，蘇區縮小到十分之一？不能這樣講。現在失敗沒有？到會的同志都說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分失敗？不是，是一部分失敗，刮了一陣共產風，全國人民受了教育。

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學問題》，在鄭州談過二遍，就講學，現在要深入研究，否則事業就不能發展，不能鞏固。

如講責任，×××、×××有點責任。農業部×××有點責任。第一個責任是我。柯老你的發明權有沒有責任？（柯老：有）是否比我輕？你那是意識形態問題。一個1070萬噸鋼，九千萬人上陣，這個亂子就鬧大了，自己負責。同志們，自己的責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

## 給張聞天的信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

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羣分。你這次發的是什麼主意？那樣四方八面，勤勞艱

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講完沒兩天，你就心煩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們纏得脫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誰人？我認為你是旧病复发，你是老而又老的瘧疾原虫远未去掉，現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咏瘧疾詞云：“冷来冷的在冰凌上臥，热来热的在蒸籠里坐，顛时节顛的牙关錯，痛时节痛的天灵破，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場。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聞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渙乎若一听圣人棄士之言，濯然汗出，霏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棄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讀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記了，于是乎跑进了軍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現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同志之著，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電話，想到我处一談。我愿意談，近日有些忙，請待來日，先用此信，达我惱忧。

## 一个批語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

印发各同志。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軍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張凱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义到

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資產阶级立場，蓄謀破坏无产阶级專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无产阶级先鋒队，另立他們机会主义的党。这个党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員，就是証明之一。这些人在資產阶级民主革命时，他們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錯的。他們沒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們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的。高崗集团的漏网残余，現在又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們都有益。只要他們愿意洗腦筋，还是有可能爭取过来的，因为他們具有反动与革命的兩面性。他們現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綱領，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例如說，总路綫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們，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們的市場縮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針，一定要用摆事实講道理的方法，还要給他們革命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寬。

##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昨天上午我說，以“馬克思主义者應該如何对待革命的羣众运动”为題的那一个文件，“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廬山會議

中的右派朋友們，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連珠炮彈”。这个疑問，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廬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刘××同志和他的兩位助手，发大熱心，起大志願，弄出来的。廬山出現的這一場斗争，是一場階級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資產階級与无產階級兩大对抗階級的生死斗争的繼續。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紀，总之要到階級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辯證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則不成其为世界。无產階級的政治學說，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錯。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現在說，社会經濟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殘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們頭腦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資產階級思想和上层小資產階級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時間，并且需要很長的時間。这是社会上的階級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階級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議。这个道理过去沒有講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問題，例如一九五三年的高、饒問題，現在的彭、黃、張、周問題，就有許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隱到显的。人們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階級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別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饒、彭黃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曲折的性質。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禍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錯了？人們不知道他們历史的变化，不知道他們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嗎？应当逐步的、正确的向同志們講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

的性質。再則，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簡單的方法，不可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須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須采取“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寬”、“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們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們留在省委員会內，中央委員會內，个别同志还应留在中央政治局內。这样，是否有危險呢？可能有，只要我們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們的錯誤，无非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們有兩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現在，他們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張国燾、高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轉化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不恰当的話，可能不轉化为敌我矛盾，而始終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們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加以解决的話。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監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策水平，比較一九五三年高饒事件时期大为搞高了，懂事多了。廬山會議上這一場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証明嗎？还有，我們对待他們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們已經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是有的。无非是繼續搗乱，自取灭亡。那也沒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張国燾、高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員，何損于我們偉大的党和我們偉大的民族呢？但是，我們相信，一切犯錯誤的同志，除了陈、罗、張、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們必須有堅定的信心。我們党三十八年的历

史提供了充分的証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就要仍然把他們当作同志看待，当做兄弟一样看待，給以热忱的帮助，給他們以改正錯誤的时间 and 繼續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須留有余地。必須有温暖，必須有春天。不是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認为这些話都是极为重要的。

## 关于枚乘《七发》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这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讀。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創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賈誼、枚乘略遜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頗多的批判色彩嗎？“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一开头就痛罵上层統治階級的腐化。“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这些話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現在我国在共产党領導之下，無論是知識分子，党、政、軍工作人員，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說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干劲，反右傾。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肢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讌，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戕猛兽之爪牙也。

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滯、永久而不廢。虽金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尙何及哉？”枚乘所說，有些象我們的办法，对犯錯誤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將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煩意乱，坐臥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傾或“左”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滯、永久而不廢。”这个法子，我們叫做“批判从严。”“客曰：今如太子之病，可无藥石、針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說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之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峯。第九段是結論，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澀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說服而不是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講道理的方法，見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們的“处理从寬”。首尾兩段是主题，必讀。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讀。我們应当請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諾夫、斯大林、李大釗、魯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講跃进，必要，說公社之原因，兼談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馬克思“覽觀”，列宁“持筹面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讀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見故人。聊效野人獻曝之誠，贈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階級較低的阶层，有一条爭上游、鼓干劲的路綫。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階級上下两个阶层說的，不是如同我們現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資产两个对抗階級說的。我們的爭上游、鼓干劲的路綫，代表了革命的无产階級和几亿劳动人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

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上 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

同志们：

这个会开得很好。我说居心不良的人，他要走到他的反面。对于世界的阶级、对于世界的党、对于党的事业、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居心不良的人，他就要走到他的反面，就是他的目的达不到。比如讲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结果那个目的达不到，自己输了理，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比如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很充分的。比如现在印发的很多材料，抗日时期的材料，长征时期的材料，比如挑拨离间，比如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抗日阵线不能分左中右”，“分左中右就是错误的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阶级关系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提出这样的原则出来，什么“王

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样的一些观点，就是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完全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欺骗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后来高饶彭黄反党那些观点，比如“军党论”之类，挑拨党内的正常关系，认为这也有个摊摊，那也有个摊摊。这样一些观点和行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行为。这一次大量揭发的在庐山会议多少年前的分裂活动，庐山的纲领，此外还有立三路线时期，都有很多材料的。主要是见诸文字的，大家揭发出来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些。所以要论证我刚才讲的观点，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要证明这一点，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充分的。现在我不论证这些东西，因为论证就要写文章，是要许多同志做工作的。我只是提一下。资产阶级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能不犯错误，这样的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庐山会议和这次会议，全国各级党组织都在那里讨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借这个事情来教育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得到提高，更加觉悟起来。完全证明大多数人，全党干部绝大多数，比如百分之九十五，是不赞成他们的。证明我们的党是成熟的，表现出这些同志对于他们这个态度的正确。

资产阶级分子混进我们共产党里面来，我们共产党员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分很多，应该加以分析，分为两部分，大多数他们是善良的，他们能够进入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少数人大概是百分之一、二、

三、四、五，这样的数目，或者一、或者二、或者三、或者四、或者五。最近几个星期，省一級的會議暴露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那里捣乱，唯恐天下不乱。凡是出了乱子，他们就高兴，他们的原则是：“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工作顺利，他们就不舒服。一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高兴。”比如讲，猪肉不够，蔬菜不够，肥皂不够，女人头发卡子不够，乘机就来了。“你们事情办得不好呀！”叫做你们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事情。说组织开会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吭声，比如北戴河会议不吭声，郑州会议不吭声，武昌会议也不吭声，上海会议吭了几句，我们听不到。等到后来事情发生了（他们认为事情发生了），你看又是蔬菜吧，又是猪肉吧，又是部分地区的粮食吧，又是肥皂吧，还有雨伞吧，比如浙江的雨伞不够，叫做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小部分人他们要进入共产主义，要真正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困难。我讲困难不是讲他们不可能，就是刘伯承同志讲过的，要脱胎换骨。当军阀的人他是当军阀了，还有不当军阀的人，比如×××同志算个什么军阀呀，是个文阎嘛，学阎哟！不脱胎换骨，就进不了共产主义这个门。五次路线错误，立三路线错误，第一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这一次彭黄张周路线，有些人是五次，有些人不是五次，比如×××同志在立三路线时还没有来，就是彭黄在立三路线的时候，也是受打击的。这不是偶然的。五次路线的严重性，最后这两次就是高饶彭黄这两次用阴谋的方法来分裂党，这是违反党纪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有纪律，他们不知道。列宁说无产阶级的党必须要有纪律，要有铁的纪律。对于这些同志是什么纪律呢？还是铁的纪律，

还是钢的纪律，还是金、木、水、火、土，木头的纪律，还是豆腐的纪律？水的纪律，就是没有纪律，还有什么铁的纪律呢？进行分裂活动，违反纪律，其目的，其结果，一定会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另外一个专政。

团结的旗帜非常重要。团结起来，马克思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不！他们的人似乎越少越好，他们要搞一个他们的集团，要办他们的事，违反广大群众的意志。我在庐山会议讲了他们不讲团结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他们就不能进行活动了。这个口号对于他们不利，所以他们不敢提，所谓团结者，就包括了犯错误的人，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团结起来，何况没有犯错误的人？他们要去毁灭他们，他们是毁灭政策，不是团结政策，他们打的旗帜是毁灭。毁灭跟他们意见不对的，他们认为是坏人，而这个所谓坏人，实际上是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还要多。

要团结，就是要有纪律，为了全民族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这一个目的。现在的任务是全国人民、全党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铁的纪律，没有铁的纪律是不行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请问，不然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可能不可能？在过去要革命，在现在要建设，可不可能呢？没有纪律都是不可能的。团结就要有纪律。彭德怀在太行山的许多文件，请同志们拿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和彭德怀在太行山抗日时期发表的那些观点比较一下：一个国民党人，一个是共产党人，时间一个是一九二四年，一个是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共产党真比

一个国民党員要退步，这个国民党人的名字叫孙中山，要进步。孙中山受共产党的影响，为什么发表那一篇呢？我最近找着看了一下，孙中山国民党代表会第一次宣言，那里面有阶级分析这样的思想。怎么会有共产党铁的纪律呢？怎么会赞成无产阶级的纪律呢？没有共产党的语言，没有共同的立场观点，纪律是建立不起来的。我说彭德怀不如孙中山，至于張聞天也不如孙中山，孙中山那个时候是革命的，而这些同志是倒退的，是要把結成了的团体破坏。提出的口号是有利于敌人的，不利于阶级的，不利于人民的。这些观点还有一些，比如……。

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了会的，批判了这个东西，因为都是共产党的組織，馬克思主义者。这一个集团来破坏那一个集团，这是不許可的，我們不許可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組織，挑起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們也不許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撥。

## 关于反华問題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附件請同志们一看，这是我国在巴基斯坦开设展覽会的一件材料。所謂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計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說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假定說一百个人

中有十个人反对我們，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中，不过只有二亿七千万人反对我們。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們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騙對我們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况，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謠言，說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們認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綫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在我們六亿五千万人中真正反共的，最多不过百分之十，即是說，不过六千五百万人而已。而五亿八千五百万人都是拥护我們的，或者是暂时怀疑的。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在新德里展覽的各国农业館，在所謂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館参观的人民羣众达三百五十万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館。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們人数极少。第二，他們反华，损伤不了我們一根毫毛。第三，他們反华，可以激发我們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壯志，一定要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們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們自己的脚上，即是說，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面前，暴露了他們自己的丑惡面目。所以他們反华，對我們說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証明了我們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証明了我們的工作还不错。对于他們說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們的不祥之兆。蔣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一九四六年

全力大进攻，只有三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了。这件事是人人都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不过空口罵我們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們要动手打我們的話，也一定逃不脫蔣介石、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結局。請同志們想一想，假如上述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坏人或半坏人，他們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贊我們，給我們說好話，那將置我們于何地呢？我們豈不成了背叛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嗎？还有一层，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間歇性的，有題目可借，例如西藏問題和中印边界問題，他們就反一陣。这个題目也不能永远借来反华，因為他們亏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相信他們的話，每天反下去，他們越站不住脚。美国和我們的仇恨更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間歇性。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討厭，市場縮小，只好收場，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題可借，再来掀动反华。不但現在有較小的間歇性，而且將來会有較大的間歇性。看我們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說，我們全党全民真正團結一致，我們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和超过他們了，这种較大的間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說这会迫使美国人和我們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則他們就会被孤立。我們有苏联的先进經驗可資借鉴，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反苏的都沒有好結果。反得最凶的是武裝进攻苏联，这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的猖狂进攻，其失敗也最慘。因此，我想劝同志們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們的任务，想一想我們的工作，想通过这个所謂大反华問題的性質和意义，作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長期地但是間歇地反对我們。

所謂長期，至少要打算十年，甚至会有整整二十世紀的后四十年。如果給我們四十年時間的話，那时候世界情形將起大变化，那百分之十的坏人或半坏人的多数或大多数很有可能被他們自己的人民所推翻，而我国則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一吨鋼，平均每人有三千斤至四千斤粮食和飼料，多数人民有大学的文化程度，那时人們的政治覺悟水平和理論水平將提到比現在高得多，整个社会很有可能在那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总之，一切問題的中心在于我們自己的團結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 苏联《政治經濟学》讀書筆記

（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

### 第一部分（从20章到23章）

#### 一、关于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教科書P. 327——328 上說：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代替資本主义，而且要用“革命手段”。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的冲突达到了空前尖銳的程度。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这些說法都很好，是應該这样說的。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欢。說是客观必然性，就是說它不依人們的意志为轉移，不管你贊成不贊成，它总是要来的。

无产階級要“把一切劳动者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来消灭資本主义”，（P. 327）这个說法对，但是在这里还应该說到

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遇不到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能在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P.328）其实不只是“不能成长起来”，而且不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成分的合作经济和国营经济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说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主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象城市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

## 二、关于过渡时期

书中说：“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P.328）究竟过渡时期包括什么阶段，要好好的研究。只包括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是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

这里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人民公社要在若干年内，实现从基本队所有制到基本社所有制的转变，而且还要进一步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实现了基本社所有制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

在过渡时期，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P.328）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在过渡时期要“使生产力得到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须的发展。”在我国来说，大约至少要一、二亿吨钢吧。今年

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刚开始，经过五八——五九年大跃进，六〇年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

## 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性和特殊性

书中说：十月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又说：每一个国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在1848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110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就讲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承认十月革命的榜样，承认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对立起来了。~~革命~~为什么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很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有待研究。

为什么无产阶级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教科书上说：是由于“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从过去的革命历史来看，革命的中心是由西方向东方转移。18世纪末革命中心在法国，当时法国成了世界政治生活的中心。19世纪中叶革命中心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没有列宁主义就没有俄国革命的胜利；二十世纪中叶，世界革命的中心又转到了中国，当然以后革命的中心还会转移。

俄国革命的胜利，还因为有广大的农民群众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教科書說：“俄国无产阶级同貧农結成联盟”。（P.328）农民中有几个阶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依靠是貧农阶层。在革命开始时，中农总是动摇的，他要看一看。革命有没有力量，能不能站住，革命对他有没有好处，看得比较清楚了，他才转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十月革命是这样，我国的土地改革、合作社、人民公社也都是这样。

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从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准备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十月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是在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没有列宁主义也就没有俄国革命的胜利。

書中說：“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革命前的俄国有足以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里。書中引了列宁的話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較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起来。列宁曾說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薄弱的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以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都是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被压迫的痛苦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在这些方面来说，印度也是相同的。那末，印度为什么不能象列宁、斯大林說的那样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的胜利呢？

因为印度是属于英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这一点和中国不同。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印度共产党没有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使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到了印度独立后，又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經驗証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有一个成熟的党，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地参加了民主革命，1905年提出了与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的綱領。这个綱領不只是一要解决推翻沙皇的問題，而且要解决推翻沙皇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同立宪民主党争取领导权的問題。中国在1911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时还没有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即积极地参加了民主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无产阶级代替了资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代替了资产阶级政党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是在1905——1917年，那时他们的革命很有生气。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已经墮落，到了1924年没有办法只好找共产党，才看到前途。我們常說，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的时候还不成熟，从主要的意見上来说，就是指我們的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时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可能，并且也没有做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教科書在这里（P.331）还有这种意思：资本主义前的經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之所以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这样說是不完全的。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主要的由于我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統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們的帮助是一个重

要条件，但是这个条件不能决定我們能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問題，只能影响我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前进得快点和慢点的問題。有帮助可以快一点，沒有帮助会慢一点。所謂帮助，包括他們經濟上的援助，同时也包括我們對他們成功和失敗的正面和反面的經驗的学习。

#### 四、关于“和平过渡”的問題

書上說：“某些資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階級通过議會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P.330）这里的“某些”究竟是哪些呢？欧洲的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北美洲的国家，現在都武裝到牙齿，他們能讓你和平地取得政权嗎？

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准备兩手，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就总的趋势來說，資產階級不愿意放棄政权，他們要掙扎，資產階級在要命的时候，他們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和我国革命都曾准备好了兩手的。俄国1917年7月以前，列宁曾經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表明了把政权和平地轉入无产階級手里已不可能，就轉过来进行三个月的武裝准备，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經過十月革命，无产階級夺得政权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贖买”的方法消灭資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資產階級勾結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裝暴动和武裝干涉，在俄国党领导下进行了三年的武裝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 五、关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几个問題

P.330 最后一段說到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轉变，如何轉变？沒有講清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帶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遺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立即宣布土地国有令，但是完成土地問題的民主革命也还用了一段时间。

我国在解放战争中，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的基本完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我們还用了三年的时间来完成土地改革，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們立即沒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資產80%的官僚資本主义企业轉为全民所有制。

我国在解放战争中除了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号召外，还提出了反对官僚資本主义。反对官僚資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兩重性，一方面是反官僚資本就是反买办資本，是民主革命性質的，另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对大資產階級，又帶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質。

官僚資本的很大一部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从日本、德国、意大利手中接收过来的，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的比重是8:2。我們解放后，全部沒收了官僚資本，就把中国資本主义的主要成分消灭了。

如果以为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只主要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只是在將來才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 六、关于暴力和无产階級专政

P.333上对暴力这个概念使用得不够确切。馬克思、恩格斯总是講“国家就是用来鎮压敌对階級的暴力机关”，那么总不能够說“无产阶级專政不仅仅是对剝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不是使用暴力。”

剝削階級在要命的时候总是要动武的。而且只要他看到革命一起来，他們就要用武力把革命扑灭。教科書說：“历史經驗証明，剝削階級不愿意把政权讓給人民而使用武力反对人民政权”，（P.333）这个說法不完全。不仅是在人民已經組織了革命政权以后，剝削階級要用暴力来反对革命政权，而且人民起来向他們夺取政权的时候，他們就用暴力来鎮压革命的人民。

我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鎮压敌人的反抗。沒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怎么能行呢？

書中这里还說到无产阶级專政的“实質”，說到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要任务”，也說的不完全。沒有說对敌人的鎮压，也沒有提到階級的改造，地主、官僚、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要改造，資产階級、上层小資产階級要改造，中农也要改造。我們的經驗証明，改造是不容易的，不經過反复的多次的斗争，都不能改造好的。彻底消灭資产階級殘余势力和他們的影响，至少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甚至要半个世紀。在农村來說，基本的社有制实行了，私有变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大工业，全国交通运输都現代化了，經濟情况真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会逐步的以至完全的改变过来。（按：書中在这里到講“主要任务”时，引用列宁的話，与列宁的原意不符合）。

說話；写文章都力求合乎敌人、帝国主义的口味，这是欺騙羣众，其結果是敌人舒服，而自己的階級被蒙蔽了。

## 七、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問題

P.334上說：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可以“有各种各样”。这是对的。但是人民民主国家无产阶级專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專政的形式，其实質並沒有多大区别。苏联的苏維埃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代表會議，只不过是名称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以資产階級名义参加的代表，有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代表，有其他民主人士的代表，他們都接受共产党的領導，其中有一部分人想鬧事，但鬧不起来。这种形式好象与苏維埃不同，但是十月革命后，苏維埃的代表中有孟什維克右派社会革命党，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諾維也夫派等等。他們名义上是工人、农民的代表，实質上也是資产階級的代表。那时（指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接受了克倫斯基的国家机关中的大量人員，这些人都是資产階級分子。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各部門的成員都是根据地里出来的，而且大多数的骨干都是共产党员。

## 八、关于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P.335上关于中国的資本主义所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說得不对。只說了我們对民族資本的政策，沒有說我們对官僚資本的政策（沒收）。对于官僚資本的財產，我們是采取沒收的办法来实现公有化的。

P.338上第二段的意思是把經過国家資本主义的形式来

改造資本主義當成一種個別的特殊經驗，否定這種經驗的普遍意義。西歐各國和美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高，少數的壟斷資本家占統治地位，但同時也還有大量的中小資本家，據說美國的資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在這些國家革命成功以後，壟斷資本要沒收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中小資本家也一律沒收嗎？是不是也要採取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來改造他們呢？

我國的東北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發展很高的地區，以上海和蘇南為中心的江蘇省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發展很高的地區，既然我國這些省區可以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那麼世界上同我們這些省分類似的國家為什麼不可以實行這個政策呢？

日本人過去在東北的辦法是消滅當地的大資本家，把他們的企业變成日本的国营企业，或者壟斷資本的企业，而對於當地的中小資本家，則用建立母子公司的辦法來加以控制。

我們對於民族資本主義的改造經過三個步驟，即加工訂貨、統購統銷（征購包銷？）公私合營（單个企业的公私合營和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就每個步驟說，也是逐步進行的。這種辦法使生產沒有遭到什麼破壞，而且在改進過程中發展了。我們在国家資本主義問題上是有很多新的經驗的，公私合營以後，給資本家定息，就是一項新經驗。

### 九、關於中農

我國土地改革後，土地不值錢，農民不敢“冒尖”，有的同志曾經認為這種情況不好，其實經過階級鬥爭，搞臭了

地主富農，農民以窮為榮，以富為恥，這是一種好現象，這說明貧農在政治上已經壓倒了富農，而樹立了自己在農村中的優勢。

P.339中說：從富農那里沒來收交給貧農和中農的土地，政府沒收，然後政府把土地交給農民來分。這是一種恩賜觀點，不搞階級鬥爭，不搞羣眾運動。這種觀點實質上是一種右傾觀點。我們的辦法是依靠貧農，聯合大多數中農（下中農）向地主階級奪取土地，黨起引導作用，反對包辦代替，並且有一套具體的作法，那就是訪貧問苦，物色積極分子，扎根串聯，團結核心，進行訴苦，組織階級隊伍，展開階級鬥爭。

教科書中說“中農成了農村的中心人物”。這個說法不好，把中農吹成中心人物，捧到天上去，不敢得罪他們，會使過去的貧農臉上無光，其結果必然導致富裕中農掌握農村的領導權。

書中對於中農沒有分析，我們把中農分成上中農、下中農，其中還有新、老之別，新的又比老的好些。歷次運動經驗證明：貧農、新下中農、老下中農三部分人政治態度較好，擁護人民公社的是他們，在上中農、富裕中農中，一部分人擁護人民公社，一部分人反對人民公社。河北省的材料，全省共有四萬多個生產隊，其中50%完全擁護公社，沒有動搖；35%的隊基本擁護，在個別問題上有意見或者動搖；有15%的隊或者反對，或者發生嚴重動搖。這些隊所以發生嚴重動搖和反對，主要的原因是這些隊的領導被掌握在富裕中農手里，甚至掌握在壞分子手里。在這次兩條道路鬥爭的教育中，這些隊要展開辯論，首先要改變領導。可見對中農要

进行分析。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誰手里，对农村发展方向关系极大。

書上說 (P.340)：“中农按其基本性說来是兩重性的”。对这問題也要作具体分析，貧农、下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一方面都是劳动者，一方面又都是私有者。但是作为私有者來說，他們的私有观念是各不相同的，貧农、下中农可以說是半私有者，他們的私有观念比較容易改变，上中农和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就比較濃厚，历来他們对于合作化有抵触。

#### 十、关于工农联盟

P.340 三、四段上講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是沒有敘述工农联盟怎样才能发展和巩固。講了对小生产者农民要进行改造，但是沒有講进行改造的过程，沒有講这个过程中每个阶段中有什么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也沒有敘述整个改造过程的步驟和策略。

我們的工农联盟已經經過了兩個阶段，第一是建立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第二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要兩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統購統銷就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統購統銷的政策才能坚持，才能彻底实行。現在我們的工农联盟要进一步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單有合作化、公社化而无机械化，工农联盟是不能巩固的。就合作化來說，如果只是小合作化，工农联盟也是不巩固的。还必须从合作化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由社有发展到国有，在国有化和机械化互相結合的基础上，我們就能够把工农联盟真正的巩固起来，工农之間的差別就会逐步消失。

#### 十一、关于知識分子的改造

P.341 專講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識分子，吸收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但是沒有講对知識分子的改造，不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識分子也因在各方面受資產階級的影响而需要进行改造。文艺界的刘紹棠当了作家以后，大反社会主义就是証明。在知識分子中，世界觀的問題常常表現在对知識的看法上，究竟知識是公有还是私有？有些人把知識看成自己的财产，待价而沽，沒有高价錢就不出卖，他們只專不紅，說党“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搞電影的說党不能領導電影，搞歌舞的說党不能領導歌舞，搞原子能科學的說党不能領導原子能科學事業，总之說党不能領導一切。

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中，对知識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問題，不重視這個問題，对資產階級的东西采取將就态度当然是不对的。

同頁上說过渡时期的經濟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对的，但这段只說在經濟生活上的一切領域中开展誰战胜誰的斗争，都是不完全的。我們的說法是在三条战綫上即政治、經濟、思想的战綫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書上說我們吸收資產階級分子参加企业管理和国家管理 (P.357 也是这样說)，但我們提出資產階級分子进行改造的任务，帮助他們改变自己的生活習慣、世界觀以及个别問題上的观点，書上在这里都不提改造。

## 十二、关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关系

書上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看成是农业集体化的前提，这种說法并不合乎苏联自己的情况。苏联基本上实现集体化是在1930年至1932年，那个时候，他們的拖拉机虽然比我們多，但是1932年机耕面积不到耕地面积的20.3%。集体化不完全决定于机械化，故工业化不是前提。

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集体化完成得很慢，重要的原因是在土地改革以后，沒有趁热打铁，而是間歇了一个时期，我們的一些根据地也出現过一部分农民满足于土地改革而不愿再向前进的現象。問題并不在于有沒有工业化。

## 十三、关于战争与革命

P.352——354上說：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能够在沒有国内战争和国外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成社会主义。又說，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沒有經過国内战争。应当說，这些国家是通过国际战争的形式来进行国内战争的，是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合而为一的进行的，这些国家的反动派是苏联紅軍的铁犁犁掉的。說这些国家沒有国内战争，是只从形式上看問題，沒有看到实質的說法。

教科書說东欧各国在革命后“議會成了广泛代表人民利益的机构”，其实这种議會同旧的资产阶級議會完全不同，只是名义上的相同。我們解放初期的政治协商會議，名义上同国民党时期的政治协商會議是一样的，同国民党談判的时候，我們对政治协商會議不感兴趣，蒋介石却很有兴趣。解放以后，我們把这个招牌接过来，召开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

會議，起了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教科書上說中国“在革命斗争的进程中，組織了人民民主統一战线”（P.357）为什么只提革命斗争，不提革命战争？从1927年起直到全国胜利，我們进行了22年延續不断的革命战争。在这以前，从1911年的资产阶級革命开始，还有15年的战争。这里面有革命战争，也有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的軍閥混战。如果从1911年算起，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可以說連續进行了40年的战争，其中包括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我們党成立之后参加和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有30年。

大革命不能不經過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則。只看到战争的坏处，不看到战争的好处，这是战争問題上的片面性，片面的講战争的毁灭性对于人民革命是不利的。

## 十四、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

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設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級的毒害很厉害，已經滲透到了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級还只有三代，而英、法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級已經有了几十代了。他們资产阶級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来至三百多年，资产阶級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所以英国的工人阶級不跟着共产党走，而要跟着工党走。

列宁說：“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更困难”。这个說法現在看来不对。其实經濟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人数比較多，工資水平比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級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看来并不那么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程度很高，革命

成功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問題不大，重要的問題是人民的改造。在东方象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現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就生产力的发展的速度也比他們快得多。就資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赶上先进的，例如在19世紀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二十世紀初德国又超过英国。

### 十五、大工业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嗎？

教科書說：“走上社会主义建設道路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項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經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資本主义統治的这些后果。”

（P.364）这里把发展大工业說成是对經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說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証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我們的革命开始于宣傳馬列主义，这是要造成新的社会輿論，以推行革命，在革命中推翻落后的上层建筑以后，方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于是就可以大搞技术革命，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繼續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造，进行思想改造。

这本教科書只講物質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階級的国家，階級的哲学，階級的科学。經濟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經濟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問題，經濟基础生产关系的問題，不容易說得清楚。

### 十六、列宁論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

（P.375）引用列宁的一段話，講得很好，可以用来辯护我們的作法。他講到：“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計劃或那种計劃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我們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我們的大跃进就是实现这种計劃或那种計劃的尝试。

### 十七、工业化的速度是个尖銳的問題

教科書：“工业化的速度对于苏联是一个很尖銳的問題。”（P.326）現在我国的速度問題也是一个很尖銳的問題。原来工业越落后速度問題越尖銳，不但国与国之間比較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基础比較好，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資增加相对也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原有工业基础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投資增加得很快。上海解放十年一共投資二十二亿元，其中包括資本家投資五亿多元，它原有工人五十多万人，除了調出几十万工人外，現在全市有工人百万多人，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比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方速度問題更尖銳。書上这段話只講了政治环境要求高速度，沒有講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許可高速度。这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有高速度的需要而沒有可能，那么怎能做到高速度呢？

### 十八、大、中、小并举是为了高速度

P.381上虽然提到我們广泛发展中小型企业，但並沒有正确的反映我們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思想。說我們“規

定广泛地发展中小型企业，由于国内的技术经济十分落后，人口众多，以及实际的就业问题。”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旧，人口众多，增加就业。我们在大的主导下，大量的发展中小型企业，在洋的主导下普遍采用土法，主要是为了高速度。

### 十九、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可以长期并存吗？

教科书P.386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不能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散漫而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由此推论下去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的所有制的基础上。”

苏联的两种所有制并存的时间太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实际上是工农的矛盾，教科书上不承认这个矛盾。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同样会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不断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这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的工业和农业的生产与分配。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关系这个时候适合生产力，过一个时候就不适合了。我国在完成高级合作化以后，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问

题。

社会主义社会里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但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为生产力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经济范畴是永恒不变的吗？能说按劳分配，集体所有制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象其他范畴一样是历史范畴吗？

### 二十、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只靠机器

P.392上说：“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教科书上很多地方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人和训练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

P.395上说：实行全盘集体化的初期的任务，提到和敌对富农分子的斗争等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教科书对合作化以后农村的情况的叙述，却不讲富裕阶层的问题，也不讲内部矛盾。例如国家和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等等。

P.402上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涨的条件下，广大的中农群众不再动摇。”不能笼统地这样说。一部分富裕中农现在动摇，将来还会动摇。

### 二十一、所谓“彻底巩固”

“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P.407）“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

彻底呢？如果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間，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就蚕的一生来说，不但它最后一定要死亡，而且它一生发展过程中要经过蚕子、蚕、蛹、飞蛾这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要进行到后一阶段，每一阶段都不能彻底巩固的。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新的质（生下来很多蚕子），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是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发展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是部分质变。人也是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生到死是一个量变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进行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人的机体里，细胞不断地分裂，不断有旧的细胞死亡，新的细胞的生长，人死了就达到整个的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不断的部分的质变而完成的。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中有量变，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

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质变。如果没有部分质变，没有大量的量变，最后的质变也不能到来。例如一个工厂，厂房有了，规模有了，里面的机器设备部分地，部分地更新，这就是部分的质变。工厂规模外形都没变，但工厂的内部变了。一个连队也一样，百多人打了一仗，伤亡了几十人，要补充几十个人，不断地战斗，不断地补充，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地部分的质变使这个连队不断地发展坚强起来。

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间同样有部分质变。在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和旧的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的公有制组成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难道就没有它进一步变化的过程吗？难道我们能说：“这两种所有制长远地彻底巩固下去”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永生不灭的么？难道是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死亡变化么？难道不象其它的历史范畴一样都是历史的范畴么？

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要死亡。共产主义时期也还是有不断的发展的。共产主义可能要经过许多不同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什么都不变了么？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了，就只有量变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么？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另一个阶段的，不断的进行的。但是每个阶段总是有个“边”。我们每天读书，从四点钟开始，到七、八点钟结束，这就是“边”。拿思想改造来说，社会主义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每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总是有个结束，就是有个“边”。在社会主义思想战线上经过不断的量变，不断地部分质变，总有一天资本主义思想的

影响完全肃清了，到那时，这种思想改造的質变也就完成了，然后又开始新的質的量变过程。

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墨。例如：工业产品与多少比重，生产多少鋼，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說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說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可以叫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二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即由比較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較发达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長的时间。經過了后一阶段，物質产品、精神财富都大为丰富，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大为提高，就可以进入到共产主义高級阶段了。

P.409上說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生产不断迅速地扩大，生产率不断提高，講了許多“不断”，但只有量的变化，沒有許多部分的質变。

## 二十二、关于战争与和平

P.408上說到在資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使失业者的增加”，这就是酝酿着战争。难道馬克思經济学原理忽然失灵了么？难道世界上还存在着資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能彻底消灭战争嗎？

能不能說現在出現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現了把世界一切物力财力利用到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說法沒有馬列主义，沒有階級分析，沒有把資產階級統治下的情况与无产階級統治下的情况区别开来。不消灭階級怎么能消灭战争？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們，即使签定了不打仗

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仗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来用不用原子彈、氢彈，那是另外一个問題。虽然有了化学武器，但是打仗的时候沒有用，还是用常規武器的。即使在两个陣营之間不打仗也不能保証資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也可能打仗，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現在就在打。战争是階級冲突的一种方法，只有經過战争才能消灭階級，只有消灭階級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就能不消灭階級。我們不相信，沒有消灭階級，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在人类的階級社会历史上，任何階級，任何国家，都是注意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軍隊是階級实力的具体表現。只要有階級对抗，就有軍隊。当然我們是不希望打仗的，我們是希望和平的，我們贊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爭取两个陣营簽訂互不侵犯的协定。爭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們最早提出来的主張，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張，对整个社会主义陣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設都是很有利的。

P.409說：現在苏联已不再受資本主义的包圍了。这个說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險。当然現在的情况已經和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有很大的改变，在苏联的西方有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东方有我們、朝鮮、越南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導彈沒有眼睛，它可以打几千公里，万把公里，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周圍布满了美国的軍事基地，这些軍事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能够說苏联現在已經不在導彈的包圍之中了嗎？

### 二十三、“一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嗎？

P.413上說社会主义“团结一致”，“坚如磐石”，說一致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只承認团结一致，不承認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有矛盾，不承認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規律就被否定了，辯証法就中断了。沒有矛盾就沒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 二十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权利

P.414講到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沒有講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这是最根本的权利。沒有这种权利就沒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

社会主义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沒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們的影响的問題，象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誰的手里，由誰来发議論，都是屬於权利的問題。如果这些东西掌握在右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手里，那么全国絕大多数迫切需要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剝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鐘惦裴这些人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种派別，有党派性，一切机关，一切企业，掌握在哪一派的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問題关系极大。掌握在馬列主义

者手里，絕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或是右派分子手里，这些机关这些企业就可能变质，人民对这些机关这些企业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須有权管理上层建筑，我們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問題了解为国家只是由部分人管理，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險等等权利。

### 二十五、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是革命？

P.417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沒有同共产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

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但是不能說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質的飞跃，就是革命。我国的个体經濟变为集体經濟，再从集体經濟变为全民經濟，都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轉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不能不說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当然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可能是主要物資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資实行按需供应，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到其它产品去。

拿我国的人民公社的发展來說，在从基本队有制轉变为基本社有制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間会不会发生抵触現象，这个問題值得研究。我們现实这个轉变的一个决定性条件是社有經濟的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实现基本社有制，对于一般社員都是有利的，这样，估計对絕大多数人不会抵触，但是原来的队干部，那个时候，他們不能象原来那样当家作主了，他們的管理权力势必相对縮小，他們对于这

种改变会不会抵触呢？

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阶级，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例如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他们很有利，在转到按需分配时，他们可能会不舒服。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人这个动物就是怪，他有一点优越条件就有架子，……不注意很危险。

## 二十六、所谓“中国没有必要采取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形式”

P. 419说得不对。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看到那个时候俄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形，断定无产阶级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无产阶级没有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权，认为只要他们动手，就能使无产阶级政权垮台，于是他们实行武装的反抗，这就使得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激烈的办法来没收他们的财产，那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方都还没有经验。

说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尖锐，这不合实际，中国革命可尖锐呢。我们连续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打垮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没收了占整个资本主义经济80%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20%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办法来加以改造，在改造过程中，还经过了“三反”、“五反”那样激烈的斗争。

P. 420 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描写得不对。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逼出来的。我

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行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看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资本家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并不是公方代表和资本家共同管理生产，不能说：“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受到了限制”，而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教科书上没有吸取我们所说的公私合营企业是3/4的社会主义这个意思，当然现在说不是3/4，而是9/10，甚至更多了。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基本完成，但是有机会他们还是要猖狂进攻的，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被我们打退了，一九五九年又通过他们在党内的代表向我们进行了一次进攻。我们对民族资本家的策略是拉住他们又套住他们。

书中採用了列宁的话（P. 421），国家资本主义是“阶级斗争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这是对的。

## 二十七、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期限

P. 423 页上说：我们在一九五七年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这样说，而是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同页上说，要在十年或十五年内把中国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倒可以同意。这就是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

后，再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到一九七二年争取提前二、三年到一九六九年，除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以外，还要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早了。

## 二十八、再谈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

P.423 上说，在工业化实现以前，所有制的改革已经取得胜利是在中国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情形。这种话讲得不对。在东欧这些国家同我们一样，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援助”这样两个条件，为什么不能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完成所有制方面（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呢？至于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苏联也是先解决了所有制的問題，然后才实现工业化的。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也不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而是在工业革命以前，也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然后进行宣传取得实力，才大大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搞好了，走上轨道了，也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拿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说，先是简单的协作，然后发展为工场手工业，这时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手工工场还不是用机器生产。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创造了条件，在英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

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德、法、美、日也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以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才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也是一般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不同（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封建社会中初步成长起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

## 第二部分（从 24 章到 29 章）

### 二十九、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

P.433 頁上只是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而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可以说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总还是全民所有制，但同样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理，这仍然是重要问题。一九五八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地发挥这些单位的积极性，中央不能靠自己的积极性，必须发挥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妨碍这种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可见在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中也还有要解决的矛盾，至于劳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更是要不断改进的。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在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例如，领导人探

取平等态度，改变某些规章制度，“兩参”“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作。原始公社的公有制時間很長，但是人們在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

### 三十、集体所有制必然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P.435 上只講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必然性，沒有講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是客观必然性。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現在我国有些地方就已明显地看出来，河北省成安县的一个材料說：有些經濟作物区的公社現在很富，积累提高到了45%，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高。这种情况如果繼續发展下去，不讓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来解决这个矛盾，农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比工人高，对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P.438 上說“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之間的差別不是根本性的差別……具有两种形式的公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同資本主义比較起来，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間的差別不是根本性的差別。就社会主义經濟內部來說，兩者之間的差別又是根本性的差別。教科書把这两种公有制的形式說成“是神圣不可侵犯”，如果就敌对势力来講是可以的，如果要就本身的发展过程來說，那就錯了。任何东西都不能看作是永恆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恆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变化的过程。

若干年以后，人民公社的社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以后，全国就出現單一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在一个时期內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質的全民所有制，在經過一定的时期才进而为單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所以全民

所有制也有一个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变化过程。頁一四

三十一、关于个人财产  
P.439 說：“另一部分是消費品……成为劳动者的个人财产。”这种說法使人以为社会产品中原屬於消費品的部分就要分配給劳动者成为个人财产，这是不对的。消費品中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設備，公共医疗，体育設備，公园等等，而且这部分公共财产会越来越多。当然这部分也归每个劳动者享受，但它不是个人财产。

P.440 上把劳动收入和儲蓄、住宅、家庭用品、个人消費品及其他日常設備等并列起来，不好。因为儲蓄，住宅等都是劳动人民收入轉化而来的。

这本书在不少地方只談个人消費，不講社会消費，如公共文化、福利事业、卫生等，这是一种片面性。我們农村中的房屋还是很不象样子的，要有步骤的改变农村居住条件。我国居民房屋的建設，特别是城市居民房屋，主要是應該用集体的社会力量来搞，不应靠个人力量。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搞社会集体事业，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有人說“社会主义比資本主义更注意物質刺激”，这种說法簡直是不象样子。

教科書在这段說，集体农庄生产的财产，包括个人财产，包括个人付业。对于这种个人付业不提公有化的問題，这样农民就永远是农民。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時間之內需要巩固它。但这种巩固必須要有一个限制，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否則就会使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識形态僵化起来。使人們的思想不能适应新的变化。

同一頁上說到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的問題：“這種結合是用按着社會成員的勞動數量和質量支付勞動報酬的方法，貫徹個人物質利益的原則來實現的”。這裡沒有講必要的扣留，而且把個人利益放在這種結合的第一位，就把個人物質利益原則片面化了。

接着P.441上說：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矛盾不是對抗的，可以得到逐步的解決。說得很空，不能解決問題。象我們這樣的國家，人民內部矛盾如果不是一二年整一次風，是永遠得不到解決的。

### 三十二、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

443頁第五段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存在，也講要克服這些矛盾，但是並不承認矛盾是動力。

接下去的一段講得很好，但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只是人與人的關係的某些方面和領導經濟同某些形式會妨礙生產力的發展，而且所有制方面（例如兩種所有制）也存在着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問題。

再下面一段的說法就很有問題，說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說法不合乎辯證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哪里有什麼可以調和的矛盾呢？有的矛盾是對抗性的，有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但不能說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可以調和的矛盾。

社會主義制度下雖然沒有戰爭，但是還有鬥爭，有人民內部各派鬥爭。社會主義制度下雖然沒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但是還有革命。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

是革命，從共產主義這一階段過渡到另一階段也是革命，還有技術革命，文化革命，共產主義一定會要經過很多階段，也一定會有許多革命。

這裡說到依靠羣眾的“積極活動”來及時克服矛盾（P.444），所謂“積極活動”就應該包括複雜的鬥爭。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力圖保持過時的經濟關係的階級”，這個說法對。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還有保守的階層，還有類似的“既得利益集團”，還存有着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城市和農村、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差別，雖然這些是非對抗性的矛盾，但是也要經過鬥爭才能得到解決矛盾。

我們的幹部子弟很令人耽心，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總還有先進的人和落后的人，有對集體事業忠心耿耿、勤勤懇懇，朝氣勃勃的人，有為名為利，為私為己、暮氣沉沉的人。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每個時期，都會有一部分人樂於保存落后的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農村中的富裕中農在許多問題上都有他自己的觀點，他們不能適應新的變化，並且其中有一部分人對這種變化進行抵抗，廣東農村中同富裕中農展開八字憲法的辯論就是證明。

P.453但是接着後段中說：“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這個說法不當，矛盾是動力，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解決矛盾的方法。

三十三、關於認識的辯證過程

隨着社會主義公有化，人們成為自

己社会經济关系的主人”，其“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規律”。应该看到这里要有一个过程，認識規律总是开始少数人認識，然后多数人認識，从不認識到認識要經過实践的过程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没有什麼先知先觉。人們要經過实践取得成績，发生問題遇到失敗，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認識逐步推进。要認識事物发展的客观規律，必須經過实践，必須採取馬列主义的态度，而且必須經過成功与失敗的比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經過多次的胜利和失敗，並且进行認真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只看見胜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也是不行的。

所謂“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規律”这是不容易的。不經過一定的过程是不能實現的。446頁上引恩格斯的話：“开始完全自觉的自己創造自己的历史，只是在这个时候，人們所推动的社会原因才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和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产生他們所希望的结果。”說是“开始”，是“愈来愈大”，这就比較准确。

教科書不承認現象和本質的矛盾，本質总是藏在現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現象，才能揭露本質。教科書沒有写出人認識規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鋒队也不能例外。

#### 三十四、关于工会和一长制

P.452 說到工会的使命时，不講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不講如何加強政治教育，只偏重講福利。

全文提到“依据一長制的原則管理生产”。一切資本主义国家企业都是实行一長制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原則应

当同資本主义企业有根本的區別。我們所实行的在党委领导下厂長負責制就使我們同資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严格地区別开来。

#### 三十五、从原理原則出发不是馬列主义的方法

从第二章以后列举了許多規律。

《資本論》对資本主义經济的分析是从現象出发，找出本質，然后用本質解釋現象，因此能够提綱挈領。而教科書的办法是不进行分析，文章写得很乱，它总是从規律、原理、原則、定义出发，这是馬列主义从来所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則的结果是要經過分析，經過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認識总是先接触現象，从現象出发找出原理原則来，而教科書却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繹法。形式邏輯說：“人都要死，張三是人，所以張三要死。”这是从人都死这个大前提出发得出的結論，这是演繹法。教科書对每个問題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推理。他們不懂得大前提应当是研究問題的结果，必須經過具体分析，才能够发现和証明原則原理。

#### 三十六、先进經驗能毫无阻碍地推行嗎？

P.461 三段上說：“在社会主义国民經济中，能够在一切企业里毫无阻碍的推广科学的最新成就、技术发明和先进經驗。”可不一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学閥”，他們控制科学研究机关，压制新生力量。因此科学的最新成就也不是毫无阻碍的得到推广的，这种說法实际上不承認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矛盾。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人們的不

習慣，或者因為人們的不了解，或者因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相抵觸，就會遇到阻礙。例如我們的密植、深翻這種事情本身沒有階級性，但還是受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對和抵抗。當然社會主義社會里阻礙新東西的情形同資本主義社會是根本不同的。

### 三十七、關於計劃工作

P.465 上引用恩格斯的語，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這是對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國民經濟的平衡，是經過經濟危機達到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可能經過計劃來實現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認我們對必要比例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教科書在這裡說：“自發性和自流性是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但是不能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里就沒有自發性和自流性，我們對於規律的認識不是一開始就很完善，實際工作告訴我們在一個時期內可以這樣的計劃，可以有這些人的計劃，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計劃，不能說這些人的計劃都是合乎規律的，一定是有些計劃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規律，有些計劃就不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規律。

認為對比例關係的認識不要有個過程，不要經過成功或失敗的比較，不要經過曲折的發展都是形而上學的看法。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但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世界上沒有天生的聖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了“先知先覺”。為什麼教科書過去沒有出版？為什麼出版了要一次再一次地修改？還不是過去認識不清楚，現在也還認識不完善嗎？拿我們自己的經驗來說，開始我們也不懂得社

會主義，以後在實踐中逐步有了認識，認識了一些，但也不是認識夠了。如果說夠了，那就沒有事做了。

P.466 上說社會主義的特點是“經常自覺地保持比例”。這是一個任務，一個要求。要實現這個任務是不容易的。斯大林就說過蘇聯的計劃還不能說已經完全反映了規律的要求。

經常保持比例同時也就是經常出現不平衡，因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例如經濟發展了，到處都感到技術人員不夠，幹部太少，于是就出現幹部的需要和幹部分配的矛盾，就促進我們多辦學校，多培養幹部來解決這個矛盾，出現了不平衡，出現了不成比例，人們也就進一步認識客觀規律。

在計劃工作上，如果什麼帳都不算，一切聽其自然或四平八穩，要求絲毫的漏洞都沒有，這兩種做法都是不對的，其結果都會破壞比例。

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過去我們計劃規定沿海地區不建設新的工業，一九五七年以前沒有進行什麼建設，耽誤了七年的時間，一九五八年以後才開始大的建設，兩年中得到很大的發展。這就說明象計劃之類意識形態的東西，對經濟的發展或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

### 三十八、關於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和工農業并舉

P.466 上說到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問題。

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經

济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也不能扩大再生产。在斯大林时期，由于特别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也有过同样的问题。我们的办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一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和其他几个并举，每个并举中又有主导的方面。农业不上去，许多问题不得解决，我们提出工农业并举已经四年了，真正实行是在一九六〇年。重视农业就表现在拨给农业钢材的数量上，一九五九年给农业的钢材只有五十万吨，今年包括水利建设一共是一百三十万吨，这算是真正是工农业并举了。

这里谈到一九二五——一九五八年苏联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一百零三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十五点六倍。问题是一百零三倍同十五点六倍的比例是否对工业发展有利。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是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只要我们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的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与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 三十九、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

二十章中说：“利用工人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是国营工业高涨的必要条件。”二十一章中又说：“彻底实行经济核算，利用把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同社会主义生产的利益结合起来的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在为国家工业化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二十五章中接着又

说：“社会主义的生产的目的……使劳动者密切关心大力提高生产，使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P.456）象这样地把“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只会带来发展个人主义的危险。

P.452 又说按劳分配规律“使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执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计划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决定性动力之一”。人们不能不问：“既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方向，怎么又把个人物质利益说成生产的决定性的动力？”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应当是生产资料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把消费品的分配看成决定性的动力，是对马克思上述的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这是一种理论上的错误。

### 四十、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

P.452（第二段）中把党组织放在地方经济机关之后，地方经济机关成了头，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地方党组织就不能在当地挂帅，党组织不挂帅要在当地充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是不行的。P.457虽然承认群众的创造活动，但是说：“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是加快共产主义建设速度的最重要条件之一。”P.447也说：“社员主动性是发展农业的决定因素之一。”这样把群众斗争只看作“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反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者创

造的，而不是羣眾創造的。

緊接着又提到：“首先要利用物質鼓勵因素。”好象羣眾的創造性活動是要靠物質利益鼓勵出來的。這本書有一機會就講個人物質利益，好象總是想用這個東西來引人入勝。這反映了相當多的經濟工作人員和領導人員的精神狀態，也反映了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不靠物質鼓勵，就沒有別的法子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前半句是說要盡最大努力來生產。為什麼要把這兩句話分開，總是片面地講物質鼓勵呢？象這樣地宣傳物質利益，資本主義成了不可戰勝的了。

#### 四十一、關於平衡和不平衡

P.432（一段）寫得不對，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問題是它們這種平衡和不平衡同社會主義制度下技術發展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質上不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有技術發展的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們的地質工作人員只有二百多人，地質勘探的情況同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極不平衡，經過幾年來加強工作，這種不平衡已經走上平衡，但是技術發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現了。目前我國手工勞動還占很大很大比重，同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廣泛開展技術革命來解決這個不平衡。每逢一個新的技術部門出現以後，技術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又會特別顯著，例如我們現在要搞尖端技術，也就感到許多東西不相適應。書中的這段話既否認了資本主義下某種平衡，也否認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某種不平衡。

技術的發展是這樣，經濟的發展也是這樣，這本書中沒有接觸到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波浪式前進，說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點波浪都沒有，這是不能設想的。任何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波浪形的，螺旋式的。我們讀書也是波浪式的，讀書之前做別的事情，讀了幾個鐘頭以後要休息，不能無日無夜的讀下去，今天讀得多，明天讀得少，而且每天讀的時候，有時議論多，有時議論少，這些都是波浪式，都是起伏。平衡是對不平衡說的，沒有不平衡就沒有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與不平衡的矛盾在各個方面，各個部門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斷地產生，不斷地解決，有了今年的計劃，又要有第二年的計劃，有了年度的計劃，又要有季度的計劃，有了季度的計劃還要有月的計劃。一年十二個月，月月要解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計劃常常要修改就是因為新的不平衡的情況又出來了。

教科書中沒有充分運用辯證法，對各個問題沒有用辯證法來研究。關於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這一章寫得很長，但沒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教科書中~~社會主義社會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並不消失，“物之不平，物之情也”。因為消滅私有制，可以有計劃的組織經濟，所以就有可能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的客觀規律，以造成許多相對的、暫時的平衡。

生產力跑得快造成了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上層建築不適應生產關係的情況，於是就要改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求得適應。上層建築適應生產關係，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或者說它們之間達到平衡是相對的，生產力總是要不斷

前进，所以总是不平衡。平衡和不平衡是矛盾的两个侧面，其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否则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普遍的规律，这个普遍的规律难道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吗？应当说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适用这个规律。矛盾、斗争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计划工作中的各种平衡也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不能设想有一种平衡是没有条件的，是永恒的。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做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未加研究，这是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了国家论，阶级斗争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革命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

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是情况不同，二是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和规律，例如矛盾的统一，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定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四十二、关于所谓“物质刺激”

P. 486上說：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尚未成为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第一需要，所以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段的“一切成员”講得太籠統了。列宁也是社会成员之一，能够說他的劳动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嗎？

P. 486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部分人：极大多数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有些工作者却不老实对待自己的义务。这个分析得很对，但是要使一部分不老实对待自己义务的人转变过来，也不能光靠物质刺激，还必须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

書中这段說到较为勤勉积极的工作者，在同样的条件下能制造出更多的产品。是否勤勉积极，显然是决定于政治觉悟，而不决定于文化技术水平的高低。有些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另外有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较低些，可是很勤勉，很积极。原因是前一种人觉悟低些，后一种人觉悟高些。

上書說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促使生产增加”（P. 486）“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P. 487）。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变化。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需要物质刺激。在困难的时候，减少一些物质刺激，人们也要干，而且干得很好。教科書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他们不能解释同级工资中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說，都是五級工，可是有一部分人干得很好，有一部分人就干得很不好，还有一部分人干得大体上还好。物质刺激都是一样，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照他們的道理是解釋不通的。

即使承認物质刺激是一个重要的原則，但总不是唯一的

原則，总还要有另一个原則，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精神鼓励的原則。同时，物質刺激也不能單講个人利益，还应该講集体利益，应该講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長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 \* \* \* \*

在“对劳动的物質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一节(P.501)中关于竞赛，有些地方写得还不错，缺点是沒有講政治。

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加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东西有也可以，沒有也可以，我們要使人民有些觉悟。教科書上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強調，只強調个人物質利益，常常把物質利益的原則，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質利益的原則，有一点偷天換日的味道。

他們不講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利益也就解决了，他們所強調的个人物質利益，实际上是近視眼的个人主义。这种傾向，是无产階級同資产階級斗争时期的經濟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的表現。在資产階級革命时期，許多資产階級革命家英勇牺牲，也并不是为个人眼前利益，而是为这个階級的利益，为这个階級的后代的利益。

在根据地的時候，我們实行供給制，人們还健康些，并不为了追求待遇而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資制了，評了級，反而問題發生的多，許多人常常为了爭級別而吵架，要做很多的說服工作。

我們党是連續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長期实行供給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給制，但是实行供給制的人員，內战时期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人，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

解放初期，大致过的是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質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励。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打了败仗，在这以前打了胜仗，在这以后还是打了胜仗，这并不是因为沒有或者有物質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綫、軍事路綫錯誤或正确，这些历史經驗，对于我們解决社会主义建設的問題有很大意义。

\* \* \* \* \*

二十六章說：“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者，从物質利益关心自己的結果，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P.482)

二十七章說：熟練劳动力的报酬較高，……这就刺激了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使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質区别逐漸消失。(P.501, 503)

这段說熟練劳动的报酬較高，促使非熟練劳动者不断上进，以便进入熟練工人的行列。这个意思就是說，为了多挣钱就来学文化，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进学校学技术，学文化，首先应認為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設，为了工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首先为了高工資。

二十八章中还說：“按劳分配是推动生产发展的最大力量。”(P.526)而在P.526的末段，在說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資不断提高以后，未修訂的三版本中还有“社会主义比資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样的話。說社会主义比資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工資的不断提高，很不对。工資是消費品的分配，沒有生产資料的分配，就不会有产品的分配，不会有消費品的分配，前者是决定后者的。

#### 四十三、关于社会主义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

### 四十三、关于社会主义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

彭真同志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經濟領導者的威信，取決於他們聯繫羣眾的程度，取決於人民對他們的信任。”這句話講得好，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須做工作。我們的經驗——如果幹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是自己的，而看成幹部的。幹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願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不能以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自然會出現勞動者和企业領導人員的創造性的合作。

既然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为什么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实行一长制而不能实行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制，”即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呢？

政治弱，就只好講物質刺激了，所以接下去馬上就說：“徹底行使使工作者从个人物質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原則……是进一步掌握提高社会主义生产的主要源泉。”

#### 四十四、关于突击和赶任务

P.505上說：“消除赶任务的現象，按图表均衡的进行生产。”未修訂的三版上這句話是：“要同突击現象作斗争，要按預定的进度表均衡地工作。”根本否認突击，赶任务，講得太絕對了。

不能完全否認突击，突击和不突击是对立的統一。在自然界中有和风細雨，也有疾風暴雨，突击和不突击也是波浪式起伏。在生产方面的技术革命，常常发生需要突击的情形。农业生产要搶季节，唱戏要有高潮。否定了突击，实际

上就是不承認高潮。苏联要赶美国，我們想不用苏联那么多時間达到苏联这样的水平，这些也都是突击。

社会主义竞赛就是落后者赶上先进者，就是要经过突击才能达到的。人与人，组与组，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都是要竞赛，要赶先进，也就会有突击。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土改，合作化，会造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缘故，不是因为突击的缘故。

#### 四十五、关于价值规律与计划工作

P. 521用小字印的一段，正確。有批評，有議論。

价值規律作为計劃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規律作为計劃工作的重要依据，我們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規律的要求，而是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依据我們扩大生产的需要。如果單从价值規律的观点来看，我們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結論，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鋼鐵說成是无效劳动，土鋼質量低，国大補貼多，經濟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来看，大办鋼鐵好象是吃了亏的，但从整体和長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因为大办鋼鐵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經濟建設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許多新的鋼鐵基地和其他工业基点，这样就使我們有可能大大加快我們的速度。

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有七千五百多万人，用搞这样两次大规模的运动的办法，我们的水利问题就可以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

更可以增加得多，增加得快，农业生产可以更稳定，那么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也就更能够满足人民对粮食的需要。

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制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赚或者赔了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中自己已经提出了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列宁和斯大林都说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要向国家进贡。”我国绝大多数农民是积极“进贡”的，只有富裕中农里面15%的人不高兴，他们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

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当然价格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前几年我们曾经提高生猪的收购价格，对于发展养猪有积极作用，但是象现在这样大量的普遍的养猪，主要还是靠计划。

P. 521上说到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问题，他们那种集体农庄市场自由太大了，对这种市场的价格只用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调节是不够的，还要有领导，有控制。我国初级市场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幅度，不让小自由成为大自由。

P. 522上说：由于掌握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带来资本主义下的那种生产无政府状态，产生浪费社会劳动力的现象。这种说法，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发生危机，主要不是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全国有计划的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自由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当然也是由于它的所有制决定的。

#### 四十六、关于工资形式

P. 530讲工资形式主张以计件工资为主，计时工资为辅。我们是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片面强调计件工资会造成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部分工人中“为挣大件而斗争”的心理，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收入。有的材料说明计件工资制还有碍于技术革新和机械化的采用。

书上承认在生产自动化的情况下，不宜于实行计件工资，一面说要广泛发展生产自动化，一面又说要广泛采用计件工资形式，这就自相矛盾起来了。

我们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这两年的年终跃进奖，就是这种奖励，除了国家工作人员，教育工作者以外，其它职工中普遍有年终跃进奖，谁发多，谁发少，由每个单位的职工自己评定。

#### 四十七、关于价格的两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个消费品的价格问题，书上说：“社会主义一贯实行降低人民消费品价格的政策。”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一般不涨也不降。我国工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普遍的就业，物价低，房租低，职工生活水平并不坏。究竟是不断降低物价好，还是不涨不降好，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一个是重工业品和轻工业品的問題，相对说来，他们是重工业品的价格低，轻工业品的价格高。我们是重工业品的价格高，轻工业品的价格低。为什么这样？究竟怎样才

好，也值得研究。

### 第三部分（从第30章——第34章）

#### 四十八、关于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

P.547說到在建設中，反对分散建設基金。如果說大建設單位，同时搞得很多，因而都不能按时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而反对建設中的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基礎上建立起来的，根据初步安排，今后八年中鋼鐵工业要完成二十九个大型、近一百个中型、几百个小型鋼鐵基地的建設。中小型对鋼鐵工业的发展已經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来說，全年生产的生鉄，是二千多万吨，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生产的。今后中小型对鋼鐵生产的发展还是要起很大作用，許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許多中的会变成大的，落后的变成先进的，土的变成洋的，这是客观发展的規律。

我們是要采用先进的技术，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落后的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然不可避免性，从有历史以来，在革命战争中总是拿武器差的人打败拿武器好的人，内战的时候，抗日战争的时候，解放战争的时候，我們沒有全国的政权，沒有近代化的兵工厂，如果一定要有了最新武器才能打仗，那就等于自己解除了武器。

我們要實現象教科書上所說的全盤机械化（P.420），看来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在第三个十年中間，在今后一个时期內因为机械不够，半机械化和改良工具，还是我們要提倡的，現在我們还不一般地提倡自动化。机械化要講，

但是不要講得过火。机械化，自动化講得过火了，会使人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經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地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模样、高标准，看不起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以后，这个偏向才克服。

在农业上我們現在不提化学化，一是因为多少年内还不能生产很多的化肥，已有一点化肥，但只能集中使用于經濟作物。二是因为提了这个，大家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无机肥料也要有，但是如果只靠它而不同有机肥料結合起来，会使土壤硬化。

教科書中說，在一切部門采用新技术。但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总是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且在采用了某种新机器的同时，总是有許多旧机器。教科書中說到，一方面新建企业，并对現有工厂进行設備更新，同时充分合理地使用現有的机器和机械（P.427）。这样的說法就对了，將來永远都会是如此。

至于大的洋的方面，我們也一定要自力更生地搞。一九五八年提出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的口号，事实証明自己来搞还可以做到的。过去，落后的資本主义国家靠采用新技术而在生产上赶上了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苏联也靠采用先进技术而赶上資本主义国家，我們也一定这样做，也一定能够做到。

#### 四十九、先有拖拉机，还是先有合作化？

P.563上說：“在一九二八年全盤集体化的前夕，春季作物地的翻耕工作有百分之九十九还是采用木犁和馬拉犁。”

这个事实推翻了教科書上很多地方关于“要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观点，而同頁上所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发展农业生产力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开辟了广泛的場所”則是对的。

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規律。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化搞得很慢，到現在还没有完成，主要不是由于他們沒有拖拉机（相对的說来，它們比我們多得多），主要是它們的土地改革是从上而下的恩賜的，它們沒收土地是限額的（有的国家一百公頃以上的土地才沒收），是用行政命令来进行沒收工作的。土地改革以后又沒有趁热打鐵，中間整整歇了五、六年，我們則与它們相反，实行羣众路綫，发动貧农、下中农展开階級斗争，夺取地主階級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平均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土改以后，紧接着开展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的不断前进地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們有了強大的党，強大的軍隊，我軍南下时，各省都配备了从省、地到县、区整套的地方工作的干部班子，而且一到目的地，立即深入农村，訪貧問苦，扎根串連，把貧农下中农的积极分子組織起来。

#### 五十、关于一大二公

苏联的集体农庄合并过兩次，由二十五万多合并为九万三千多个，又合并为七万个左右，將來势必还要扩大。教科書上說要“加强和发展各集体农庄的生产关系，組織集体农庄之間的公用生产企业等等。”（P. 568）事实上有些地方和我們的方法类似，但是不用我們的說法而已。它的將來，

即使办法和我們一样，看来也不会用公社的名称。說法和名称的不同，包括一个实質的問題，就是羣众路綫的实行不实行問題。

当然，苏联集体农庄扩大規模，按戶数人数來說，可能不会象我們这样大，因为他們农村人口稀、土地多，但能因为这样就說現在集体农庄再不需要扩大了么？我們的新疆、青海这些地方，虽然人少地多，但仍旧需要扩大公社。我們南方几省有些县，如閩北的一些县也是在人少地多条件下搞起大公社的。

扩大公社是一个重大問題，量变了，一定会引起質变，会促进質变。我們的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首先是大，接着就必然提高“公”的水平，也就是說量变必然帶來部分質变。

#### 五十一、特別強調物質利益的原因何在？

在集体农庄制度一章內，反复講个人物質利益，如 P. 565、P. 571，等等。現在特別強調物質利益总有个原因。斯大林时代过分強調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強調公的，不注意私的；現在走到了反面，又过分強調物質（个人？）利益，不大注意集体利益，这样強調下去，又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

公是对私說的，私是对公說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統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們从来講公私兼顧，早就說过沒有什麼大公无私，又說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兩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

同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性質也各有不同。例如遺傳和變異也是对立統一的兩重性，如果只有變異的一面，沒有遺傳的一面，那么下一代的生物和上一代的生物就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狗也不成其为狗，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可以起好的积极的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生物在一定时期內採取一定的形态固定起来，或者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还是稻子。但是如果只有遺傳的一面，沒有變異的一面，那么就沒有改进、发展，永远停頓下来了。

## 五十二、事在人为

書上說：“集体农庄有形成級差地租的經濟条件和自然条件”。（P.577）級差地租不完全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其实还是事在人为。例如河北省省內京汉沿綫的机井很多，津浦沿綫的机井却很少。自然条件相似，交通一样方便，但是土地的改良却是各有不同，这里可能有土地利于不利于改良的原因，也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历史原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事在人为”。

同时，上海郊区，有的养猪养的好，有的却养不好。上海崇明县原来說那里各种自然条件，例如湖多，不利于养猪，現在打破了畏难情緒，对养猪事业採取了积极的态度以后，却看到这些自然条件不但不妨碍养猪，反而有利于养猪。实际上，深耕細作、机械化、集体化也都是事在人为。北京昌平县常鬧水旱災害，修了十三陵水庫，情况改变了，还不是“事在人为”嗎？河南省計劃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以后再用三年治黄河，完成几个大型水渠的建設，也都証明“事在人为”。

## 五十三、关于运输和商业

运输、包裝不增加使用价值，但是增加价值，运输、包裝所用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一部分，沒有运输、包裝，生产过程就沒有完成，不能轉到消費过程，使用价值虽然生产出来了，也不能說实现。例如煤炭，在矿山开采出来了，如果攤在矿山，不用铁路、輪船、汽車运到用戶手中，煤炭的使用价值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P.585 頁上說，他們的商业系統有兩套，即国营的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此外，还有所謂“无組織的市場”，即集体农庄市場。我們是一套，把合作社商业合并于国营商业，現在看来这一套好办事，並且各方面节省得多。

P.587 提到对商业的公共监督。我們对商业的监督，主要依靠党的領導、政治掛帅、羣众监督这一套。商业工作人員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沒有他們的劳动，生产就不能轉化为消費（包括生产的消費和生活的消費）。

## 五十四、关于工农业并举

P.623 上說到生产資料优先增長的規律，未修訂的三版本中在这里也特別提出：“生产資料优先增長，意味着工业的发展速度快于农业。”

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強調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則一定会发生問題。拿我們的辽宁來說，这个省的工业很多，城市人口佔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过去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沒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結果本省的农业不能給城市保証粮食、肉类、蔬菜的供应，

总是要从別省运粮食，运肉类，运蔬菜。主要的問題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沒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的生产发展受到限制，增長較慢。我們过去沒有了解到，恰恰是东北这样的地方，特别是辽宁这样的省，应当好好抓农业，不能只強調抓工业。

我們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謂并举，并不否認优先增長，不否認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例如今年我們估計可能生产鋼材一千四百万吨左右，拿出十分之一的鋼材来搞农业技术改造和水利建設，其余十分之九的鋼材主要还是用于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設，这在今年的条件下就是工农业并举了。这样做当然不会妨碍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快发展工业。

波蘭有三千万人口，只有四十五万头猪，現在肉类供应非常紧张，看来波蘭現在还没有把发展农业放到議事日程上来。

P.624 上說：在个别时期，要加速发展落后了的农业、輕工业和食品工业。这是好的。但是农业和輕工业的落后，所造或的比例失調，不能說成只是“局部比例失調”，这种比例失調不是局部的問題。

P.625 上說：“必須合理的分配投資，使重工业和輕工业不論何时都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这段只講重工业和輕工业，沒有講工业和农业。

#### 五十五、关于积累水平問題

在波蘭，这个問題現在成为很大的問題。哥穆尔卡起初

強調物質刺激，增加工人工資，不注意提高工人的觉悟，結果工人只想多要錢，不好好干。工資的增長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長，造成了吃老本的情况，現在逼着他們不得不出來反对物質刺激，提倡精神鼓励。哥穆尔卡也說：“錢买不到人心”。

特別強調物質刺激，看来总是难免走向自己的反面，开了很多支票，高薪阶层当然滿意，广大工人农民要求兌現，而不能兌現的时候，就会被迫地走到強調物質刺激的反面。

根据P.631 上所說情形，苏联积累資金約佔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我国积累佔国民收入的比重：一九五七年是百分之二十七，五八年是百分之三十六，五九年是百分之四十二，看来今后我国积累比重經常保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或者更多是可能的，主要的問題是生产大发展，只要生产增加了，积累比重大一点，还是可以改善人民生活的。

厉行節約，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财力，这是經常的任务，如果以为只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应当这样做，那是不对的，难道困难少，就不要節約，不要积累了么？

#### 第四部分（从第35章到結束語）

#### 五十六、关于共产主义的国家問題

P.639 上說：“在共产主义高級阶段……国家將变成不需要的东西而逐漸消亡。”但是国家的消亡还需要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沒有，这是危险的。P.640 上說，即使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国家就还是必要的，这个提法对。紧接着書上又說：“但是国家的

性質和形式將取決於共產主義制度的特點。”這句話不好懂，國家的性質是壓迫敵對勢力的機器，國內即使沒有需要壓迫的敵對勢力了，對於國外的敵對勢力，國家壓迫的性質也還沒有變。所謂國家的形式不外為軍隊、監獄、捉人、殺人等等，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家的這些形式到共產主義有什麼不同呢？

### 五十七、關於向共產主義的過渡

P.641 上說：“在社會主義社會沒有敵對的階級”，但是“還有敵對階級的殘余。”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不需要通過社會革命來實現的，只能說不需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社會革命，但是還有新的生產關係代替舊的生產關係，新的社會制度代替舊的社會制度的社會革命。

書上在這裡接着聲明：“這並不是說社會沿着通向共產主義道路發展就不需要克服內部矛盾。”不過是附帶聲明罷了。這本書雖然有些地方也承認矛盾，但不過是附帶的提起，說明問題不從分析矛盾出發，這是這本書的一個缺點。當作一門科學，就應當從矛盾分析出發。

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因為生產高度自動化，要求人們的勞動和行動更準確，那時的勞動紀律會比現在更加嚴格了。

現在我們說共產主義社會分兩個階段，即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這是馬克思他們根據當時社會發展的條件所預見的。進到高級階段以後，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一定會出現新的階段，新的目標，新的任務一定又會提出來。

### 五十八、集體所有制的發展前途

P.650 上說：“集體農莊合作社生產關係的形式完全符合農村目前生產力發展水平和需要。”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有一篇蘇聯的文章，介紹了紅十二月集體農莊的情況，說“原來幾個農莊不合并時很多事情不好辦，合并以後，這些事情都好辦了。”說：現在一共一萬人，計劃在中心建設一個住三千人的居民點。這個材料可以說明現在集體農莊的形式已經不完全適合生產力的發展了。

書上這段說：“要全力加強和繼續發展合作社集體農莊所有制。”既然需要發展，要過渡，怎麼全力加強呢？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社會制度要講巩固，但不能講得過火。書上講了模糊的前途，但一講到措施就不清楚了，從某些方面（主要是生產方面）看，他們沒有停頓，但是在生產關係方面，可以說基本上停頓不前了。

書上說，要把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單一的全民所有制，但是在我們看來，首先必須把集體所有制變成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所謂把集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就是把農業生產資料統統變為國有，把農民統統變為工人，由國家統一包起來，發給工資。現在全國農民每人平均每年的收入是八十五元，將來達到每人一百五十元，而且大部分由社發給的時候，就可以實行基本社有，這樣，再進一步變為國有，就好辦了。

### 五十九、關於消滅城市和農村的差別

P.651 的後一段對農村建設的設想很好。

既然要消滅城市和農村的差別（書上說是“基本差別”），為什麼又特別聲明並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將來的城

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設許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 六十、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建立经济体系问题

P.659 上說：“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財力来发展本国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經濟条件，有生产經驗和干部的部門，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它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生产品。”

这个提法不好。我們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們提倡全面发展，不說每个省份不必生产能靠其它省份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我們要各省尽量发展各种生产，只要不妨碍全局。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独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国，在很長時間內，全国大体上保持統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控制太死，地方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拉拉，经济发展很慢。現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們要做到全国統一的，各省又是独立的，是相对的统一，又是相对的独立。

各省服从中央決議，接受中央控制，独立解决本省的問題。而中央重大問題的決議，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做出的，例如廬山會議的決議就是如此，它既合乎全国的需要，也合乎各省的需要。能認為只有中央需要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地方就不需要反对右傾机会主义了么？我們是在全国統一計劃下，提倡各省尽量各搞一套。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只要能够就地取材，就地推銷，凡能办的事情，就都可以尽可能去办。以前是担心各省都发展了各种工业，象上海这样的城市，工业品会沒有人要，現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的。

上海已經提出向高、大、精、尖发展的方針，他們还是有事情可做的。

为什么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它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呢？正确的办法是应当各国尽量搞，以自力更生，自己尽可能的独立的搞，以不依賴别人为原则，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应当尽可能的搞好，吃飯靠外国、外省危險得很。

有些国家很小，确实象書上所說的情形：“发展所有工业部門在經濟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所不能胜任的。”那当然不要勉強去搞，我們国内有些人口少的省，如青海、宁夏，現在也很难什么都搞。

#### 六十一、社会主义各国发展能夠“拉平”嗎？

P.660 第三段：“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經濟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漸拉平。”各国人口不同，資源不同，历史条件不同，革命有先进的和后进的区别，怎样拉得平呢？一个父亲生十几个儿子，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聪明些，有的愚蠢些，怎么能拉平呢？“拉平”是布哈林的均衡論。社会主义各国經濟发展不平衡，一国之內的各省，一省之內的各县都不均衡。拿广东的卫生來說，佛山市和歧乐社搞得好的，因此佛山市和广州不平衡，歧乐社和韶关不平衡。反对不平衡是錯誤的。

#### 六十二、根本問題是制度問題

P.668 說，社会主义国家貸款和帝国主义不同。这个敘述是符合事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总比資本主义国家好。我們

懂得这个原则，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妥协总是临时的。

### 六十三、关于两个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

P.658 上說：“两个世界体系的竞赛。”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了两个世界市场的论点。教科書在这里的两个世界体系的和平竞赛，强调在两个世界体系之间建立“和平发展”的经济关系，这是把实际存在的两个世界市场变成了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的两个经济体系，这是从斯大林观点的后退。

在两个经济体系之间，其实不只是竞赛，而且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教科書避开了这个斗争。

### 六十四、关于对斯大林的批评

P.680 上所說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著作，正如斯大林的其它著作一样，有些错误的论点。P.680 上所指的两条罪状不足以服人。

一条罪状說斯大林抱着这样的观点：“商品流通似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逐渐过渡到工农业直接进行生产交换的必然性已经成熟。”

斯大林在这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有商品生产。他說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都是个别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子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事实上是作为自己

的财产来支配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只愿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产品轉讓出来，愿意以这种产品換得他們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通过买卖的交换形式以外，与城市其它经济关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

斯大林批评了苏联当时主張取消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当时商品生产同三十年前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发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教科書說斯大林似乎主張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至于产品交换问题，在斯大林只是一个设想，他并且说过，“推行这种制度，无须特别急忙，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的积累的程度而决定”。

另一条罪状是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生产领域中，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国家计划经济。”教科書提出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書說，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第一不能不說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生产资料买卖并不改变所有权。第二，不能不承認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和流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际上是一致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一个真正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

### 六十五、对教科书的总的看法

不能說这本书完全没有馬列主义，因为書中有許多观点是馬列主义。但是也不能說这本书完全是馬列主义的，因为書中有許多观点是离开馬列主义的。基本上否定这本书，还

不能做这个結論。

書上強調社会主义經濟是為全体人民服務的經濟，不是為少数剝削者謀利的經濟。書上說的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不能說完全是錯誤的，這本書基本論點說的是这个。書上也說明了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等等。由這些方面看，這本書還是社会主义的、馬克思主义的。至于在承認有計劃按比例之后，如何按比例，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各有各的辦法。

但是這本書有些基本論點是錯誤的。書上不強調政治掛帥，群眾路綫，不講兩條腿走路，片面地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宣揚物質刺激，突出個人主义。

对社会主义經濟的研究，書上不是从矛盾出發；他們實際上是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認社會矛盾是社会主义發展的动力。實際上，他們的社會中還有階級鬥爭，即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殘余的鬥爭。但是他們不承認。他們的社會中還有三種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個人所有制。當然，這種個人所有制和集體化以前的個人所有制有所不同，那時農民的生活完全建立在個人所有制上，現在是腳踏兩只船，主要是靠集體，同時又靠個人。有三種所有制就一定有矛盾鬥爭。教科書上不講這種矛盾鬥爭，不提倡羣眾運動。書上不承認先使社会主义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使整個社會成為單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後再向共產主义過渡。

書上用什麼“接近”、“融洽”的模糊說法來代替一種所有制變為另一種所有制，一種生產關係變為另一種生產關係的觀點。就這些方面看，這本書有嚴重的缺點，有嚴重的錯誤，是部分的離開了馬列主义。

這本書的寫法很不好，沒有說服力，讀起來沒有興趣。書上不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具體分析出發，提出問題，研究問題，它总是從概念出發，從定義出發，只下定義，不講道理。其實定義應當是分析的結果，不是分析的出發點。書上憑空的提出一連串規律，却不是從具體歷史發展過程分析中發現和證明規律。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不从具體歷史發展過程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

這本書的寫法不是勢如破竹、高屋建瓴，問題不突出，文章沒有說服力，讀起來沒有興趣，文章不講邏輯，甚至形式邏輯也不講。這本書看來是幾個作者分別一章一章地寫的，有分工而無統一，沒有形成教科書的體系，加上用的是從定義出發的方法，使人覺得是一本經濟學詞典，作者相當被動，很多地方自己同自己矛盾，後面同前面打架。分工合作、集體寫書，雖然是一種方法，但最好的方法是以一個人為主，帶幾個助手寫，象馬克思他們寫出來的書，才是完整嚴密系統科學的著作。

寫書有批判對象，才有生氣。這本教科書雖然也說了些正確的話，但沒有展開對錯誤觀點的批判，所以看起來很沉悶。

許多地方使人覺得這本書說的是書生的話，而不是革命家的話，經濟學家不懂得經濟實踐，並不真正內行。看起來這本書是反映了這種情況：作實際工作的人沒有概括的能力，沒有概念和規律這一套；而作理論工作的人又沒有實踐的經驗，不懂得經濟實踐，這兩種人沒有結合起來，也就是

理論与实际沒有結合起来。

這本書表明作者沒有辯証法，写經濟学教科書也要有哲学头脑；要有哲学家参加，沒有哲学头脑的作家参加，要写出好的經濟学教科書是不可能的。

\* \* \* \*

这本教科書的初版是一五五年初出版的，但主要的骨架似乎在这以前即定下来了，看来斯大林在当时定下来的架子就不大高明。

苏联現在也有八不同意這本書的写法，格·科茲洛夫《論社会主义政治經濟学的科学教程》一文，对這本書的批評，提出了帶根本性的意見，他指出這本書在方法上的缺点，他主張从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來說明規律，他提出了結構方面的建議。

从科茲洛夫这些人的批評看来，在苏联也可能产生作为这本教科書的对立面的另一本教科書来，有对立面就好了。

初步讀过這本書，可以了解到他們的写法和观点，但是还不能算是研究。最好將來以問題和論点为中心，仔細研究一下，並且搜集一些材料，也看一下不同于這本書的观点的其它已发表的文章和書报。在有爭論的問題上，有什么不同的意見，都可以了解一下，問題要弄清楚，至少也要了解兩方面的意見。

我們要批評和反对錯誤的意見，但也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要勇敢也要謹慎。

無論如何，他們写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經濟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問題，有了這本書，至少可供我們議論，並且由此引起进一步的研究。

## 六十六、关于政治經濟学教科書的写法

苏联教科書从所有制出发写，原則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的更好些。馬克思研究資本主义經濟，也主要是研究資本主义生产資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資料的分配如何决定产品分配。在資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佔有的私人性是个基本矛盾。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在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后面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兩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不是商品，社会主义的商品兩重性已不同于資本主义商品的兩重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經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之間的关系所掩盖。因此，如果还照抄馬克思的办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兩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經濟，可能会反而把問題模糊起来，使人不容易了解。

政治經濟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說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我們写政治經濟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資料私有制改变为生产資料公有制，把官僚資本私有制和資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兩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同时也要写全民所有制本身的变革，如下放体制，分級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們这里，同时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是中央部門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方專区管，有的由县管。公社管的企业，有的是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質。無論是中央管的或各

地方管的，都在統一領導下，而且具有一定的自治權。

關於在生產和勞動中人与人的關係問題，教科書中除了“同志式的合作互助關係”這樣的話以外，根本沒有接觸到實質問題，沒有在這方面進行分析和研究。所有制的問題解決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一定所有制下的人与人的關係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有制的變革，在一定時期之內，總有限度，但是在這一定時期內，人与人在生產勞動中的關係却可能是不斷變革的。我們對全民所有制的企業的管理，採用集中領導和羣眾運動相結合，黨的領導、工人羣眾和技術人員相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變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這樣一套。

關於產品分配，要重新另寫；換一種寫法，應該強調艱苦奮鬥，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不能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台電視機”這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但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遠景，那還有什麼革命的興趣和熱情呢？

#### 六十七、關於從現象到本質的研究方法

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和矛盾。

在國內戰爭和抗日戰爭的時候，我們研究戰爭的問題也是從現象出發的，敵人大、我們小，敵人強、我們弱，這是當時大量的、大家都看得到的現象。我們就是從這個現

象出發來研究和解決問題的，研究我們在小而弱的情況下，如何來戰勝大而強的敵人。我們指出，我們雖然小而弱，但是有羣眾的擁護；敵人雖大而強，但是有空子可鑽。拿內戰時期來說，敵人有幾十萬，我們只有幾萬，戰略上是敵強我弱、敵攻我防；但是他們要進攻我們，就要分成好幾路，各路又要分成好多個梯隊，常常是一個梯隊進到一個據點，而其它梯隊還在運動當中。我們就把幾萬人集中去打他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數人吃他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人去牽制還在運動中的敵人。這樣，我們在這點上就成了優勢，成了敵小我大，敵弱我強，加上他到一個地方情況不熟，羣眾不擁護他們，我們就完全可以消滅這部分敵人。

\* \* \* \*

意識形態成為系統，總是在事物運動的后面，因為思想認識是物質運動的反映。規律是在事物運動中反復出現的東西，不是偶然出現的東西，事物反復出現，才成為規律，才能够被人認識。例如資本主義的危機在過去是十年一次，經過多次反復，就有可能使我們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危機的規律。土地改革中要按人口分配土地，而不能按勞力分，這也是經過多次反復後，才認識清楚的。第二次國內戰爭後期，“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同志主張按勞力分配土地，不贊成按人口平分土地，並認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階級觀點不明確，羣眾觀點不充分，他們的口號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其他人按勞力分。這種辦法，事實證明是錯誤的，土地應該怎樣分法是經過多次反復才弄清楚的。

\* \* \* \*

馬克思主義要求邏輯和歷史一致。思想是客觀存在的反

映，邏輯是从历史中来的，而書中堆滿材料，不分析，沒有邏輯，看不出規律，不好。但是沒有材料也不好，那就使人只看見邏輯，看不見历史；而且这种邏輯只是主观主义的邏輯。这本教科書的缺点正在这里。

\* \* \* \*

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資本主义发展史。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規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規律研究清楚了，社会普遍的規律就容易認識了。要从研究許多特殊中間看出一般来，特殊規律搞不清楚，一般規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研究动物的一般規律，就必須分別研究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等等特殊規律。

### 六十八、哲学要为当前政治服务

任何哲学都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

資產階級哲学也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候都有新的理論家，写出新的理論，来为他們当前的政治服务。英国曾經出現过培根和霍布士这样的資產階級唯物論者；法国十八世紀又出現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論者；德国和俄国資產階級也有他們的唯物論者。他們都是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他們都是为当时的資產階級政治服务的，所以并不因为有了英国資產階級唯物論就不要法国的；也并不因为有了英国、法国就不要德国的和俄国的。

无产階級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更要密切地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对于我国來說，馬恩列斯的書必須讀；这是第一。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階級的思想界，

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論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單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單有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列宁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現的新問題；單有一九〇七年的《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产生的新問題。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論》、《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問題》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动派，保卫列宁主义。我們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論》和《矛盾論》，这些都是适应当时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現在我們已經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現了新的一系列的問題，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 补 遺

### 一、关于我国工业化問題

苏联第一个五年計劃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們很快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但即使这样，我們也还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因为我們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工业产值占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經济的实际情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勁情緒。

我們“八大”一次全会曾說：要在第二个五年計劃建立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又說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內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两个說法有点矛盾，沒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說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呢？現在看来，我們再有三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可以超过英国，然后再有五年，就可以实现建立工业体系的任务。

長时期內，我們这个国家應該叫做工农业国。即使鋼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如果按人口平均的产量超过英国，那么，我們的鋼产量最少需要三亿五千万吨。

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方法很有意义。我們永远提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的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車制造业，我們还比他們落后得很远，我們要一切爭取赶过它。日本这样的小国都有四百万吨的商船了，我們这样大的国家沒有这样的輪船，自己运貨，說不过去。

一九四九年，我国拥有机床九万多台，一九五九年增加到四十九万多台。日本一九五七年有六十万台，拥有机床多少，这是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国机械化的水平还很低，从上海就可以看出来，根据最近的調查材料說，那里的現代企业中机械化劳动、半机械化劳动、手工劳动各占三分之一。

苏联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現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們則差得更远，人口虽然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从一九六〇年起，十三年中还要緊張的劳动。

## 二、关于人的地位和能力

P. 488 上說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

个人的能力。未必如此。聪明人往往出在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而且年青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旧社会的規律，被压迫者文化低，但是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总是愚蠢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薪阶层也有些危險，他們的文化知識多些，但是同那低薪阶层比較起来，要愚蠢些，我們的干部子弟就不如非干部子弟。

有很多創造发明，都是在小厂里头出来的。大厂設備好，技术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現狀，不求进取，他們的創造性往往不如小厂多。最近常州有一个紡織厂創造了一个提高織布机效力的技术裝置，有助于使紡紗、織布、印染得到能力平衡。这个新技术，不在上海、天津創造出来，而在常州这样小地方創造出来。

知識是經過困难得到的，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但是因为丢了官，“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象《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孔子也是因为在許多国家受到了挫折，才轉过来搞學問，他团結了一批“失业者”，想到处出卖劳动力，可是人家不要，一直不得志，沒有办法了，只好收集民歌（詩經），整理史料（春秋）。

历史上許多先进的东西不出在先进的国家，而出在比較落后的国家；馬克思主义不出在当时資本主义比較发展的国家——英国、法国，而出在資本主义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德国并不是沒有理由的。

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明的人，現在許多大学教授，並沒有发明，而普通的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們并不是否定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別，不是不要工程师，但是这里確

实有个問題。历史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們的國內战争中，我們的各級指揮員，从文化上說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外軍事学校出来的軍官低，但我們打败了他們。

人这种动物有一种毛病，就是看不起人，有了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没有成就的人；大国、富国看不起小国、穷国，西方国家是历来看不起俄国的；中国现在还处于被看不起的位置。人家看不起我們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我們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鋼，有这么多的文盲，人家看不起我們，对我們有好处，逼着我們努力，逼着我們进步。

### 三、关于依靠群众的問題

列宁的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創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創造。”講得好。我們的羣众路綫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書引了这句话以后說：“广大劳动羣众日益直接地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門的領導。”（P.332）也講得好。但是講是講，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联共中央一九二八年的一个決議中說：“只有党和工农羣众最大限度的动員起来了，才能解决在技术和經濟方面赶上并超过資本主义国家的任务。”（P.377）这句话也講得很好。我們現在就是这样做的。斯大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别的指望，只有靠羣众，所以他們要求党和工农羣众最大限度的动員起来，后来有了点东西了，就不那么依靠羣众了。

列宁說：“真正民主意义的集中制，是要使地方的創造性、主动精神的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地順利的发展。”（P.454）說得好。羣众能够創造

出道路来，俄国的苏維埃是羣众創造的，我們的人民公社也是羣众創造的。

### 四、关于苏联和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比較

教科書P.422上引用列宁的話：“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通过国家資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这些话講得很好，列宁是个实干的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階級管理經濟沒有經驗，曾經企图通过国家資本主义的方法来訓練无产階級管理經濟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資產階級对无产階級力量估計錯誤，不接受列宁的条件进行怠工破坏，逼着工人不得不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所以国家資本主义沒有能发展。

在內战时期，俄国的困难确实很大，农业破坏了，商业联系被打断了，交通运输业不灵了，搞不到原料，不少工厂沒收了，也不能开工。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这在实际上是无代价的取得农民劳动生产品的办法。实行这样的办法，势必对农民翻箱倒柜，这个办法实在不妥，在內战結束以后，才用粮食稅制代替余粮征集制。

我們的內战时期比他們長得多，二十二年間我們在根据地中历来实行收公粮和購買余粮的办法，我們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战争中紧紧地依靠农民。

我們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經濟的經驗，培养了管理經濟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經濟恢复工作，接着我們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綫，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建設。在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間，我們是联合农民来对付資本家，而列宁曾經在一个时期說过宁愿同資本家打交道，想把資本主义变成国家資本主义，来对付小資產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苏联在新經濟政策时期，因为需要富农的粮食，所以对富农采取限制的政策，有点象我們解放初期对待民族資本家的政策。只有等到集体农庄、国营农場，一共生产了四亿普特的粮食的时候，才对富农下手，提出消灭富农，实现全盤集体化的口号①。而我們呢？却在土地改革中就把富农經濟实际上搞掉了。

苏联的合作化“在一开始农业曾經付出了很大的代价”。（P.397）这一点使东欧許多国家在实行合作化的問題上增加了許多顧慮，不敢大搞，搞起来也很慢。我們的合作化沒有減产，反而大大增产，开始很多人不信，現在相信的人慢

①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論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問題》中說：“富农在一九二七年生产了六亿多普特的粮食，其中通过农村的交換卖出了大約一亿三千万普特，这是一个十分严重，而不可忽視的力量，当时我們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生产了多少呢？大約八千万普特，其中的（商品）粮食約为三千万普特。”所以斯大林断定，“在这种情况下，向富农进行坚决进攻是不能的。”斯大林接着說：“現在我們有了充分的物質基础来打击富农。”因为一九二九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生产的粮食不下四亿普特，其中的（商品）粮食在一亿三千万普特以上。（斯大林全集十二卷一百四十二頁）

慢地多起来了。

## 五、关于总路綫形成和巩固的过程

这两年我們做了个大試驗。

全国解放初期，我們还没有管理全国經濟的經驗，所以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只能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滿意。一九五五年基本上完成了三个改造的时候，在年底和一九五六年春，找了三十几个干部談話，結果提出了十大关系，提出了多快好省。当时看了斯大林一九四九年选举演說，沙皇时代的俄国原生产鋼四百多万吨，到了一九四〇年发展到生产鋼一千八百万吨，如果以一九二一年算起，二十年只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都是社会主义，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多一点，快一点，后来提出两种方法的問題，同时还搞了一个四十条农业发展綱要，此外，当时还没有提出其他措施。

一九五六年跃进后，出来了一个反冒进。資產阶级右派抓住这条辮子，举行猖狂进攻，否定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一九五七年六月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作报告給資產阶级右派一个回击，同年九月党的三中全会恢复多快好省、四十条綱要、促进会等口号。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在人民日报上多快好省的社論。这年冬季全国开展了大規模水利建設的羣众运动。

一九五八年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問題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了以后不准再反冒进，提出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如无南宁會議，就搞不出总路綫来。五月××代表中央向八届二次代表大会作报告，會議正式通过总路綫，但是

总路綫不巩固。接着搞具体措施，主要是中央地方分权。在北戴河提出了鋼产量翻一番，大搞鋼鉄的羣众运动，即西方报纸所說的后院鋼鉄。同时展开人民公社化，接着金門打炮。这些事情，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工作中也出現了一些毛病，吃飯不要錢，把粮食和付食吃得緊張起来；刮共产风，百分之几的日用品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鋼产量北戴河定了三千万吨，武昌會議降为二千万吨，上海會議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間又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一些被那些不同意我們的人抓住，但是他們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見，兩次郑州會議不提，武昌、北京、上海會議不提，等到“左”已經反掉了，指标已經落实了，再反“左”必須反右，廬山會議需要反右的时候，出来反“左”了。

这些說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綫确不巩固。經過兩次曲折，經過廬山會議，总路綫現在比較巩固了。但是事不过三，恐怕还要准备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总路綫也將更加巩固起来。据浙江省委的材料，有些公社最近又出現了一平二調的情况，共产风也还可能再次出現。

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那次曲折，国际上出現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这次曲折，是全世界反华。

一九五七年和廬山會議的兩次整风反右，把資產階級思想影响和資產階級殘余势力批判得比較彻底，使羣众从它的威胁下面解放出来，同时破除了各种迷信，包括所謂“宪鋼法”之类迷信。

搞社会主义革命，过去不知道怎么革法，以为合作化了，公私合营以后就解决了。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們

提出了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廬山會議实际上也进行了这个革命，而且是很尖銳的革命，如果不在这次會議把右傾机会主义那条路綫打下去，是不行的。

## 六、关于帝国主义各国間的矛盾及其他

我們应当把帝国主义之間的相互斗争，看作是一件大事。列宁是把它看成一件大事的，斯大林也是这样看的。他們所說的革命的間接后备軍就是指这个。中国搞革命根据地也吃过这碗飯。我国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階級各派矛盾，这个矛盾背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因为，它們内部有这样的矛盾，只要我們善于利用这种矛盾，那么直接同我們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就只有一部分敌人，而不是全部敌人，而且我們常常能得到休整的时间。

十月革命胜利能够巩固下来，一条重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多。当时有十四个国家出兵干涉，但每个国家派的兵都不多，而且不齐心，相互勾心斗角。朝鮮战争中，美国和他的同盟国也不齐心，战争也打不大，不但美国下不了决心，而且英国不愿意，法国不愿意。

国际資產階級現在非常不安宁，任何风吹草动，它們都害怕，警惕性很高，但是章法很乱。

第二次大战后，資本主义社会中的經濟危机同馬克思的时候不同了，变化了。过去大体上是七、八年或十来年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一九五九年十四年中已經来了三次。

現在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緊張得多了，当时資本主义还有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除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英国和法国很神气，各国資產階

級对苏联也不那么怕，除了德国的殖民地被剥夺之外，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还没有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个战败了的帝国主义垮台了，英法也削弱了，衰落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十几个国家成功，殖民体系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也不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对稳定。

### 七、中国的工业革命为什么能够最迅速

西方资产阶级舆论中，现在也有人承认“中国是工业革命最迅速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康伦公司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中就说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已经有了许多国家进行过工业革命，比起以往所有国家工业革命，中国看来将是最快的一个。”

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呢？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较彻底。

我们彻底地进行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迷信，力求使人民群众在各个方面得到彻底的解放。

### 八、人口问题

消灭人口过剩，农村人口是个大问题，要解决就要生产大发展。中国有五亿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而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美国农业人口只占百分之十三，平均每人有兩千斤粮食，我们还没有他们多。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拥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就是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每个公社

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问题。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同志们：

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开会的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工作会议开会的时候，×××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问他们建议，不要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了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人起草委员会，这里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的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书面报告的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

沒有你們的意見，这个第二稿不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們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方法的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些，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用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話，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的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時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

群众批评。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的工作中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話，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或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刖足，兵法修列。不韋迁蜀，世傳吕覽。韓非囚秦，說难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所怀疑，我们可以不必理它，让专家们去研究罢！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去左丘失明一例之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对他们作了错误的处理的。我们过

去也錯誤地處理了一些干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羣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我在這裡聲明，我並不是提倡對干部，對同志，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出錯誤處理，象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我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總是有這樣錯誤處理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里，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多，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別，在正確路線領導時期，一經發現錯誤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而在錯誤路線的領導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只能由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在適當時機，通過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至於自己犯了錯誤，經過同志們的批評和上級的鑑定，作出正確處理，因而下降或調動工作的人，這種下降或調動，對於他們改正錯誤，獲得新的知識會有益處，那就不待說了。

現在有些同志，很怕羣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制羣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們的黨章的，上了我們的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實行。同志們，我們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於黨的事業的，就應當征求人民羣眾和同志們的意見，並且自己做檢討。這種檢討，有的時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

大家不滿意，再來第二次，還不滿意，再來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沒有意見了，才不做檢討。有的省委就是這樣做的。有一些省比較主動，讓大家都講話。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開始做自我批評；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開始做自我批評。還有一些省委是被迫作檢討的，象河南、甘肅、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象現在才剛剛開始作自我批評。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早做檢討，晚做檢討，只要正視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讓羣眾批評，只要採取了這種態度，都應當歡迎。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而外，沒有別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方法。

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羣眾，不發動羣眾和干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但是，如果不向羣眾和干部說明情況，不向羣眾和干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我在一九五七年這樣說過：“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黨內黨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面。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面，羣眾的積極性是不能發動起來的。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

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的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什麼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

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如果大家对問題还不了解，有意見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統一，怎样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經驗。没有民主，意見不是从羣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来好的路綫、方針、政策和办法。我們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綫、方針、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來說，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沒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沒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質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級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問題，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們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統一嗎？如果离开充分发揚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統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錯誤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

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階級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級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書記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政治局來說，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贊成，我就得服从，因为他们多数。听说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書記說了就算数。这是很錯誤的。那有一个人說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大事，不是指有了决

議以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討論，認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全面的意見，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計到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順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書記，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从前有个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里有个范增，給他出过主意，可是項羽不听范增的話。另外有个入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較能够采纳不同的意見。有个知識分子叫酈食其，去見刘邦，初一报，說是讀書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說，現在軍事时期，不見儒生。这个酈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門房的人說，你給我滾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門房的人照样进去报告了，就說好，請。請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連忙起来欢迎。酈食其因为刘邦不見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評了刘邦一頓。他說，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无視長者！这时酈食其已經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輕，所以自称長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取了酈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見。此事見《史記》酈食其和朱健傳。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項羽打了好几年仗，結果刘邦胜了，項羽败了。这不是偶然的。我們現在有一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項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要倒台。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別姬》嗎？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別姬”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講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講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讓这些同志好

好地想一想，最好有兩天不睡覺。如果他們睡得着覺，我就不高興，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戳痛。

我們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在我們這次會議期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里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志，你坐在那里去干什么呢？為什麼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問題，讓大家去紛紛議論呢？平素養成了這樣一股風氣，當着你的面不敢講話，那末你就應當回避一下。有了錯誤，一定要做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家批評。去年六月十二日，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分，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企業黨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做了第一書記，對於工作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就要担起責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在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會變成

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轉化為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沒有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這兩方面是分不開的。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叫人民民主專政。我們的口號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是怎樣實行領導呢？經過共產黨來領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部隊。無產階級團結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和階層。對反動階級，或者說，對反動階級的殘余實行專政。在我們國內，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已經消滅，現在反動階級已經沒有過去那麼厲害了，比如說，已經沒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建立時候那麼厲害了，也沒有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時候那麼厲害了。所以我們說是反動階級的殘余。但是對於這個殘余，千萬不可輕視，必須繼續同他們鬥爭。已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我們的公安系統是掌握在正確同志的手里。也可能有個別地方的公安部門，長掌握在壞人手里。還有一些做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羣眾，不依靠黨，在肅反工作中不是執行在黨委領導下通過羣眾肅反的路線，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謂專業工作。

專業工作是需要的，對於反革命分子，偵探、審訊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實行黨委領導下的羣眾路線，特別是對於整個反動階級的專政，必需依靠羣眾，依靠黨。對於反動階級實行專政，這並不是說把一切反動階級的分子統統消滅掉，而是要消滅他們的階級，用適當的方法改造他們，使他們成為新人。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巩固，政權就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羣眾發動起來，沒有羣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搗亂，還會有復辟的可能。這個問題應當警惕，也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第三點，我們應當聯合那些階級？壓迫那一些階級？這是一個根本立場的問題。工人階級應當聯合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愛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首先要聯合的是農民階級。知識分子，例如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教授，作家，藝術家，演員，醫務工作者，新聞工作者，他們不是一個階級，他們或者附屬於資產階級或者附屬於無產階級。對於知識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們才去團結呢？不是的。只要他們愛國，我們就要團結他們，並且要讓他們好好工作。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愛國的知識分子，愛國的資本家和其他愛國的人士，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這些人，在我們人民民主專政下面，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在人民的內部，要實行民主。

人民民主專政要壓迫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階級是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這些

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這些人是我們要強迫改造的，他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

我們站在哪一邊？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羣眾一邊，還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一邊呢？必須站在人民羣眾這一邊，絕不能站到人民的敵人那一邊去。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根本立場問題。

在國內是如此，在國際範圍內也是如此。各國的人民，占人口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總是要革命的，總是要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不會擁護修正主義，有些人暫時擁護，將來終究會拋棄它。他們總會逐步覺醒起來，總會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總會反對修正主義。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堅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

第四點，關於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

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例如在中國如何進行民主革命的問題，從一九二一年黨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一共二十四年，我們全黨的認識才完全統一起來。中間經過一次全黨範圍的整風，從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時間。那是一次細緻的整風，採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說，不管什麼人犯了錯誤，只要認識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幫助他認識，幫助他改正，叫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團結——批評——團結”這個公式就是在那個時候產生的。那次整風

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二万多人，到陕北以后又补充了一些，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况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方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八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认识的，不

是由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很不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我们已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它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我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的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認識，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和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一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聞記者談过，其中一个美国人叫斯諾，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〇年讓他来了。我同他談过一次話，我說：“你們知道，对于政治、軍

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干了十一年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

“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这才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〇年，那正是我们碰到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〇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经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叶，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帮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

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的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并且同今后世界的革命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由这一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一点，但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

作物的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菸、果、藥、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氏土壤学的，在威廉氏土壤学著作中，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三种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地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在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过去做的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点。如果省委书记不下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工

作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四十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使他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的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方面，有一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头几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的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做得比较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

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立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那一年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大躍進的口號。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体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幹部和羣眾還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統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要經過一段時間，碰到一些釘子，有了正反面的經驗，才有這樣的可能。現在好了，有了這些東西了，或者正在制定這些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制定一整套具体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羣眾中來的辦法，通過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工作中的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經驗，作歷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才能制定適合情況的各種條例。這件事很重要，請同志注意到這點。

工、農、兵、學、商、政、黨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我們的黨，一般說來是很好。我們黨員的成份主要是工人和貧苦農民。我們的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他們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們黨內還存在一些問題，不

要想象我們黨的情況什么都好。我們現在有一千七百萬黨員，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國以後入黨的，五十年代入黨的。建國以前入黨的只佔百分之二十，在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〇年以前入黨的，二十年代入黨的，據前八年計算有八百多人，這兩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論在老的和新的黨員里面，特別是在新黨員里面，都有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他們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是變了質的分子。還有些人掛着共產黨的招牌，但是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並不純粹，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

上面是我講的第四點。就是講，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復的實踐，在實踐里面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筋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後才有可能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在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得比較聰明些的人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這是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為總是不自覺的，帶有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干過許多蠢事嗎？

第五點，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只簡單地講幾句。

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世界上，現在還有

許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騙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騙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騙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騙之下，他們还不覺悟。但是他們总会逐步地覺悟过来，总会拥护馬克思列宁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羣众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象魯迅所写的赵太爷、錢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敗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創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們坚决地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員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統治是不会長久的。無論什么时候，現在，將來，我們这一輩子，我們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經驗，不学习苏联，要犯錯誤。人們会問：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統治了，还要学习嗎？我們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經驗。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們应当看作反面教員，从他們那里吸取教訓。

我們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團結的原則，我們始終主張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團結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罵我們。我們的態度是，由他罵去，在必要的时候，給予适当的回答。我們这个党是被罵慣了的，从前罵的不說，現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罵我們，反动的民族主义者罵我們，修正主义者罵我們；在國內，蔣介石罵我們，地、富、反、坏、右罵我們。历来就是这么罵的……我們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覺孤立。我們

在座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嗎？世界各国人民羣众已經或者將要同我們站到一起，我們会是孤立的嗎？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團結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團結起来，把中間分子團結起来，去帶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健全党，全民團結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團結，我們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設好。要團結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說我們沒有傾向性。有些人說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們不这样看。我們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武裝起来的战斗部队。我們是站在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絕不站在佔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也是这样，我們是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同志，全体人民講團結的，絕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講什么團結。只要有可能，我們也要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爭取在五項原則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們和各国人民的團結是不同范疇的兩回事情。要使全党全民團結起来，就必须发揚民主，讓人講話。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們回去，一定要讓人講話。在座的同志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領導人員都要发揚民主，讓人講話。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紀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組織秘密集团。我們不怕公开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講真話，当面講的尽些假話，騙人的話，真正的目的又不講出来。只要不是違反紀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們都允許

他講話，而且講錯了話也不要處罰。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要用道理說服人家。說而不服怎麼辦？讓他保留意見。在黨內黨外，容許少數人保留意見，是有好處的。錯誤的意見讓他暫時保留，將來他會改的。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里，而是在少數人手里。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們在開始的時候是少數。列寧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也是少數。我們黨內有這樣的經驗，在陳獨秀統治時期，在“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真理都不在領導機關的多數人手里，而是在少數人手里。歷史上的自然科學家，例如，哥白尼、加里略、達爾文，他們的學說曾在一個長時間內不被多數人承認，反而被看做錯誤的東西，當時，他們是少數。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時候，只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國的命運。

有一個捕人、殺人的問題，我還想講一下。在現在的時候，在革命勝利還只有十幾年的時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動階級還沒有改造好，有些人並且企圖復辟的時候，人總會要捕一點，殺一點，否則不能平民憤，不能鞏固人民的專政。但是不要輕易捕人，尤其不要輕易殺人。有一些壞人，鑽到我們隊伍里面的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騎在人民的頭上拉屎拉尿，窮兇極惡，嚴重地違法亂紀。這是些小蔣介石。對於這種人得有個處理，罪大惡極的，也要捕一些，還要殺幾個。因為對這樣的人，完全不捕，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就是所謂的“不可不捕，不可不殺”。但是絕不可多捕、多殺。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殺可不殺的，都堅決不捕不殺。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付市長，過去秘密投降

了國民黨，是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裏頭，我們沒有殺他。象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都得殺。還有個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蔑共產黨。後來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於這件事，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裏罷，讓他勞動去罷，殺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殺。動不動就捕人、殺人，會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講話。在這種風氣下面，就不會有多少民主。

還不要給人亂戴帽子。我們有些同志慣於拿帽子壓人，一張口就是帽子滿天飛，嚇得人不肯講話。當然，帽子總是有的，×××的報告裡面不是就有許多帽子嗎？“分散主義”不是帽子嗎？但是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戴在頭上，弄得張三分散主義，李四分散主義，什麼人都是分散主義。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適，最好不要由別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幾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這樣就會有很好的民主空氣。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裡不怕，敢於講意見。

對於犯了錯誤的人，對於那些不讓人講話的人，要採取善意幫助的態度。不要有這樣的空氣：似乎犯不得錯誤，一犯錯誤就不得了，一犯錯誤從此不得翻身。一個人犯了錯誤，只要他真心願意改正，只要確實有了自我批評，我們就要表示歡迎。頭一、二次自我批評，我們不要要求過高，檢查得還不徹底，不徹底也可以，讓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幫助他。人是要有人幫助的。應當幫助那些犯錯誤的同志認識錯誤。

如果人家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願意改正錯誤，我們就要寬恕他，對他採取寬大的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績還是主要的，能力也還行，就還可以讓他在那里繼續工作。

我在这个講話里批評了一些現象，批評了一些同志，但是沒有指名道姓，沒有指出張三李四來，你們自己心里有數。（笑聲）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第二筆賬，是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第三筆賬，是地委一級的；第四筆賬是县委一級的；第五筆賬，就算到企業黨委、公社黨委了。總之，各有各的賬。同志們，你們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來。县委的同志要領導公社黨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來，首先要建立和加強集體領導。不要再實行長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領導方法了。那個方法，黨委書記和委員們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體討論，不能有真正的集體領導。要發揚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評，要听人家的批評。自己要經得起批評，应当爭取主動首先作自我批評。有什麼就檢討什麼，一個鐘頭，頂多兩個鐘頭，傾箱倒篋而出，无非是那麼多。如果人家認為不夠，請他提出來，如果說得對，我就接受。讓人講話，是採取主動好，還是被動好？當然是主動好。已經处在被動地位了，怎麼辦？過去不民主，現在陷于被動，那也不要緊，就請大家批評吧。白天出氣，晚上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掌聲）這個時候，我坐下來，冷靜地想一想，兩三天晚上睡不着覺，想好了，想通了，然後誠懇地作一篇檢討，這不就好了嗎？總之，讓人家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家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講話就講這一些。中心是講了一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問題，在黨內、黨外發揚民主的問題。我向同志們建議，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有些同志還沒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現在就要開始建立這個思想，開始認識這個問題。我們充分地發揚了民主，就能把黨內、黨外廣大羣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使佔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做到了這些，我們的工作就會越做越好，我們遇到的困難就會較快地得到克服，我們的事業的發展就會順利得多。（熱烈鼓掌）

##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

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國民黨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們還有幾年。

農民本來已經發動起來，但是還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地主、富農復辟的問題。還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話：國民黨在台灣，搞了一個政綱，土地改為農民所有，但又保護地主）。各地方、各部專搞那些具體問題，而對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問題不去搞。

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分要化。（×××同志揭露鄧子恢同志五個報告中的問題。）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討論就走，這種辦法不好。為什麼不請鄧子恢來？他不來，我們對台戲唱不成。建議中心

小組再加五人：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吳冷西、胡繩。

資本主義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說几千年，講那么長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淨？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現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資本主义服务，实际上是反革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書，有一段按語講資產階級消灭了，只有資本主义思想殘余的影响，講錯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經濟是个考驗。这是一种大考驗，將來还要經受更重大的考驗。苏联經過兩次大战的大考驗，走了許多曲折的道路，現在还出修正主义。我們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們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說，土改比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資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識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剝削階級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沒有了。思想意識方面的影响是長期的。高級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資產階級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單干了近十年，沒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購物券，他們的券并不比我們少。

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材料。这个由康生同志負責，搞一个經濟資料。

动摇分子坚决鬧單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讓他們單干二三年再說。他們早回来，对集体經

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要講一片黑暗。一九六〇年以来，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單干，全部或者大部單干。据說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則，农业就沒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戶，單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實質上叫大部單干。任务提得很明确，兩极分化，貪污盜竊，投机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边富裕，而軍、烈、工、干四屬、五保（戶），这边就要貧困。

赫魯曉夫還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場。

（康生同志插話：現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經濟。）

內务部一个司長，到鳳城宣傳安徽包产到戶的經驗。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見。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領導要有个态度，否則錯誤东西泛濫。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資本主义、社会主义。資本主义又有买办階級。美国資本主义农場，平均每个場有十六戶，我們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戶。包产到戶，大戶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飯，为天下中农謀福利。

河北开明，有这么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付隊長，听了批評“一片黑暗”的論調的傳達，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〇年以来，講兩年多了，我也可以反你一下嘛。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轟隆隆的，由北往南去的象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象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每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好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员。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不散，要做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将资产阶级加以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对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就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

动，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开展。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误，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漑（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要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二千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腫，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处分，绝大多数人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则。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書記（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

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央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入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

罗隆基說，我們現在采取的措施，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要搞階級斗争。我們要搞一萬年的階級斗争，不然，我們豈不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講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見，过兩天可能順口成章。

三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資本主义的改造很順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饶漱石，長期沒有发现。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資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話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級台风，他們准备接管政府，我們来个反攻，所有学校陣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〇年大跃进。六〇年开始搞十二条，六一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

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压弱劳动。

有这样一种农民，兩方面都要爭夺，地富要爭夺，我們要爭夺。

小資产階級、农民有兩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們要爭夺。无产階級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貧农，还要爭取中农。我們按劳付酬，但要照顧四屬、五保。

二千万人，呼之則来，揮之則去，不是共产党当权，那个能办到。

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會議，提出的商业政策沒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沒有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經濟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影响。商业部應該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講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鵝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購。打击集体，有利單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問題。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做得好，象軍事、外交；有些部象計委、經委，还有財貿办、农业办等口子，問題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攬，情况不清楚，怎么独攬？人吃了飯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門鬧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別的部門或到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門之間，干部交流，再給試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說不能再給了。

財經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請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強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羣众。

謝天謝地，最近組織部来了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們都曉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曉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誰曉得他們干些什么呢？几个主要經濟部門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說各省也有这个问题。